

第三章 甯氏对环北部湾地区的开发

狭义的环北部湾地区，是指濒临环绕在南海北部的海湾各市县，包括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港、钦州和北海三市，广东省雷州半岛西侧各市县和海南岛西部的各市县，以及越南北部沿海各市县。

环北部湾的开发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当时的越人在这里造船采珠，并用简陋的石器从事粗放的农业生产。秦汉时期，环北部湾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汉武帝时，合浦港成为官方港口，汉朝使者从合浦港起航，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远达斯里兰卡。然而，环北部湾的全面开发是在南朝至隋唐时期，诸如城市建设、造船业、煮盐业、采珠业等，都在此时期形成规模。此时期环北部湾的开发组织者，就是甯氏家族。自南朝历隋至唐初，钦州一带属甯氏家族辖区，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能在这个地区推行；辖区之内，甯氏世代口含宪章，手握予夺之权，其喜怒哀乐，足关人命。《隋书·食货志》载：“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其军国所需杂物，随土而出，临时折课市收，乃无恒定法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这就道出了中央王朝与甯氏家族的关系，仅是进贡方物土产这一层关系和名义上的臣服罢了，而其治下各州县的政绩如何，朝廷是不能过问的。下面，我们试探讨甯氏家族统治钦州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

第一节 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情况，标志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贸易的水准。甯氏家族在钦州统治的鼎盛时期，由于人力、财力相对充足，促使他们建造了许多城镇。这些城镇的建造，对于甯氏家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隋唐时期广西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贸易相当繁荣。现将历年在钦州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隋唐城址情况逐一介绍如下：

一、隋唐钦江故城

隋唐钦江故城位于钦州县城东北 25 公里的久隆公社大队上东坝生产队东北。1963 年和 1976 年，广东省考古队和广西文物队曾两度考察该遗城城址。城址南

北长约 200 米，东西宽约 180 米。开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南门最宽，是为正门。由是观之，城是坐北朝南。城墙用红色土夯筑而成，极坚实。现在所看到的残存城墙，高出地面 5~10 米，墙底部厚 8 米，墙顶厚 3~4 米。城址四周护城池尚依稀可辨。该城址现已全部辟为水田。城址四野平坦，土质松软肥沃，水源比较丰富。城址内出土有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绳纹红砖、菱纹红砖、青瓷碗片、玉璧形碗足、青瓷罐等隋唐时期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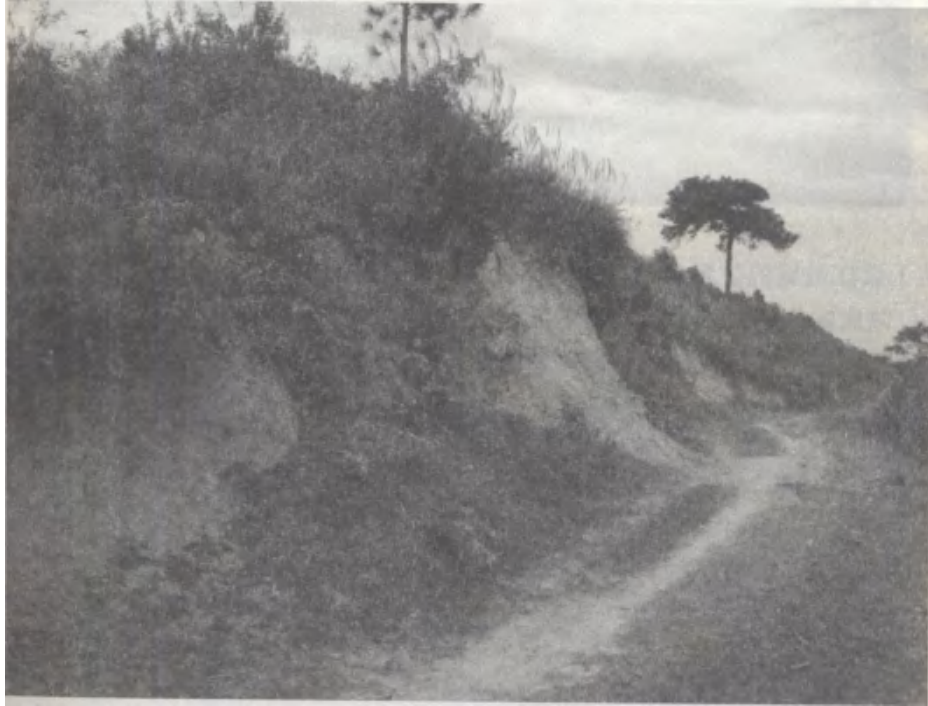


图 3-1 钦江故城遗址东段城墙

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载：“钦江废县，州东北百三十里（实际上只有五十里），刘宋时宋寿郡治也。齐梁因之，隋废郡为宋寿县。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改曰钦江县，为钦州治。唐因之，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省入灵山县。”久隆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载大致相符，仅在里程上略有出入，这恐怕是顾祖禹没有到实地调查，转抄前人之文而误。据此，刘宋时这里就是宋寿郡郡治，但从考古发现的器物来看，其年代多系隋唐时器物。估计该城在刘宋时规模较小，隋时将城扩建，而将刘宋时的城址埋在地下，因此我们在地表很难捡到南朝刘宋时期的遗物。甯猛力曾任宋寿县开国侯，此城当系甯猛力在世时扩建。

关于钦江故城的位置问题，《明一统志》却另有看法：“钦江故城，隋置，在州东三十里，隋唐时州于此。”对此，前人已提出怀疑。《读史方輿纪要》说：“（明）

一统志，今州东三十里有钦州故城即隋唐时州治，恐误。”据考古调查，在钦州东三十里地没有发现古城址。唯在钦州东北五十里处有久隆古城址。久隆城址位于钦江江滨，其周围又都是甯氏族人墓，这里是隋唐时钦江故城无疑。《明一统志》之说，估计是修志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错误。



图 3-2 钦江故城遗址保护标志



图 3-3 钦江故城天然护城河——钦江

二、灵山县旧州古城址

旧州古城址位于灵山县城西 60 公里旧州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旧州圩西南部约 300 米，坐北向南，北靠山冈，东南临旧州河，是天然护城河。城址南北长 270 米，东西宽约 135 米，面积 36450 平方米。四周土墙均有残留。城墙残最高 5 米，

城墙底宽 14 米，顶宽 8 米，系用黄色泥土夯筑。北门尚残存，其余城门已全部毁坏。城内偏东北有一高出地面的高台，长 12 米，宽 10 米，高 2.5 米，疑是检阅台。1962 年广东省考古队在旧州城址考察时，在城址内检到的遗物有筒瓦、板瓦、陶罐口沿残件。依据这些遗物，广东省考古队将旧州城定为隋唐钦江故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旧州城址曾作过钦州州治。《灵山县志》载：“钦州旧址在县西八十里下东乡，今立市名旧州圩，唐自钦江徙州治于此，至宋又自此徙州治于安远。” [1] 《钦县县志》：“钦州故城，在城东北五十里，地名高沙，土城。隋开皇时，迁于旧州，宋天圣间迁于近海白沙之东即今治。旧州故址尚存。按旧州现为灵山属。”



图 3-4 旧州城遗址

2000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灵山县志》将灵山旧州称为“钦州故城遗址”，并认为：钦州原称安州，州治在今陆屋镇西一里。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设立南宾县，县治设在南宾寨（今旧州圩西南）；唐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南宾县治从南宾寨迁到六峰山北的峰子岭南，钦州治地从陆屋迁至南宾寨，钦州治地在今之旧州西南，前后 391 年，其间数易州名。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改为钦州总管府，7 年后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为甯越郡；唐肃宗乾元元年《钦州市民族志》复改为钦州，自此钦州之名沿用

至今。宋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钦州军事推官徐的见旧州“地卑气郁”，地方经济落后，气候环境恶劣，人多死于瘴疠，加上江河淤塞，船不能通行，因而建议将州治迁到海滨。转运使司封员外郎郑天益曾到钦州沿海一带视察，最后选定安远县治作为州治驻地，并由郑天益向朝廷奏准，于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将州治从南宾寨迁至安县（今钦州市）自此以后不再迁动。《钦州市民族志》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王朝将钦州治所迁到今灵山县的南宾砦（即旧南宾县城，今旧州），从此，甯氏豪族不得再在钦州地区世袭为官，但他们盘踞该地的时间较长，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直至唐朝中叶，仍为钦州地区的豪酋。”

以上各家所言，共同点是都认为钦州州治在隋唐时期从钦州久隆迁到灵山县旧州。一说是隋开皇时迁旧州，一说是唐贞观十年迁旧州。到底谁说为对呢？我们认为各说皆误。据《宋史·地理志》：“钦州，甯越郡军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废遵化、钦江、内亭三县。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徙州治南宾砦。”《读史方輿纪要》：“南宾废县：县西八十里，隋置南宾县治此，唐改为灵山县。宋志：钦州，天圣元年徙治南宾砦。盖尚取故县为名也。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又徙今治。”《钦县县志》：“按南宾砦即灵山旧州圩。徐的因地卑气郁，迁来未久，即有再迁安远之议。”由此可知，宋天圣元年钦州州治才从钦江县（即久隆钦江故城）迁到灵山县的旧州圩。地方换了但县名没有换，仍然叫钦江县。后来作志者不慎审，皆误将旧州说成隋唐时钦州州治所在。据此可以推测，现在的旧州土城城址当是隋唐时甯越郡南宾县县治。宋天圣元年才钦州州治从久隆钦江县故城迁到灵山县旧州。广东省考古队认为土城之外尚有外城，很可能是宋天圣元年徙钦州州治于此时所建。

三、越州古城

越州古城在浦北县泉水镇坡子坪村村委前，北距浦北县城约65公里，西距泉水镇治约12公里。古城南濒南流江，依山势构成，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地势极为险要，可扼今浦北、合浦、博白三县交界一带。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墙长360米，西墙长280米。北墙、东墙依山势构筑，不平直。整个外城面积

约为 250 亩，包括四座小山包在内。在城内的东北面有三个山包，呈“品”字形。内城构筑在西部的一个山包上。内城呈长方形：南北宽约为 130 米，东西长约为 160 米。在外城四周均有护城池，现已辟为水田。



图 3-5 越州古城遗址城墙



图 3-6 越州古城护城河遗址

1962 年，广东省考古队曾试掘过此城，依据出土遗物为据，将此城定为隋城。《清一统志》云：“越州故城在合浦县东北。”《广东通志》云：“越州故城在县东北八十里。”坡子坪古城址所处的位置与史书所载大致相符。《南齐书·州郡志》载：“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地也。……宋泰始中，两江都护陈伯绍猎北地，

见二青牛惊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元徽二年（公元 474 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坡子坪古城东门为穿山而成，与文载吻合：另外当地群众都称坡子坪古城址为青牛城，与文载“见二青牛惊入草”之说吻合，足证坡子坪是为越州古城无疑。越州古城始建于南朝刘齐元徽二年（公元 474 年），沿用至唐代。1978 年，广西文物队曾深入勘察，在城址内发现了残铁刀、方格纹印纹陶等隋唐以前的遗物，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隋唐时期的陶瓷器以及瓦当、城砖。另外，在城内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唐朝乾元年间的铜钟。这说明越州古城在隋唐时期曾经过多次修建。浦北一地在隋唐时是甯氏家族辖地，甯道明据南越州反即是此地。城址的修造与他们有很大关系。



图 3-7 越州古城排水道遗址

四、浦北县旧州古城

旧州古城位于今浦北县泉水镇旧州村，南依南流江，北距泉水镇约为 1 公里。因破坏比较严重，无法从地表丈量城址的尺寸，但从整个地势观察，该城镇当分成内城和外城。

《读史方輿纪要》云：“廉州故城：在府东北七十五里蓬莱乡。唐时州治此《广东通志》云：“今名旧州村。”1978 年广西文物队曾勘察过此城址，在城址内发现的遗物有筒瓦、布纹板瓦、莲花纹瓦当、玉璧形碗足、青黄釉陶片等。其年

代属唐。考古调查资料与志书记载相符。旧州当是唐时廉州州治所在。《新唐书》卷二百二：“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甯暄亦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考古调查资料中未发现唐以前的遗物，此城的建造当始于甯氏族人甯纯。



图 3-8 唐廉州城遗址保护标志



图 3-9 唐廉州城遗址城墙顶部

上述考古发现可知，钦江故城和越州古城都城是在南朝宋时所建，当时甯氏家族还在定州，早期建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而浦北县廉州故城、灵山南宾县故城都是隋唐时期所建，应是甯氏家族所为。尽管甯氏家族没有参与钦江故城和

越州古城早期建设，但从考古发现情况看，钦江故城没有发现隋唐以前的遗物，越州古城发现有少量隋唐以前的遗物，大量的遗物是隋唐时期的陶瓷器以及瓦当、城砖。可见南朝刘宋时期的城较小，现在看到的钦江故城和越州古城遗址，主要是甯氏家族的杰作，而灵山旧州南宾县故城和浦北县廉州故城则是甯氏家族新建。



图 3-10 唐廉州城护城河

关于环北部湾的城市建筑布局问题，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发掘，还无法知道其详情。但从方形的四周城墙看，城内布局应当是中国传统的棋局组合形式。符合方正、规矩、均衡、对称的建筑艺术原则。从出土的筒瓦、板瓦、瓦当等遗物看，当时的房屋顶部，已用板瓦做仰面，筒瓦做覆面，并在屋滴水处的檐面部分粘贴莲花纹瓦当。莲花纹瓦当制作非常精致，在一个圆形的平面上，浮雕莲蓬、莲子、莲瓣，再施以表釉，远看恰似一朵盛放的莲花。将这些瓦当贴在檐面，既可以保护与面的稳固，又起到装饰美的效果。

环北部湾的城市建设，自汉代就已开始。汉城目前仅见合浦郡治一处。汉代合浦郡治故城在什么地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考古工作者苦苦寻找的目标，历 50 余年都没找到，直到 2007 年考古工作者才在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找到它的线索，而且是在不经意中发现的。20 世纪 80 年代，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西南侧的一座小岭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 10 处古窑址，初步断定为汉

代窑址。1993年，合浦县人民政府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一直没有发掘。2007年10月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合浦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窑址群进行第一次发掘。古窑址群西临南流江的分支——西门江，东为一条人工河，一江一河在窑址南侧交汇后流入北部湾，窑址距入海口约10公里。发掘结果表明，古窑址的砌砖较大，是明朝砖的风格，因此初步断定窑址的年代为明代。而引起专家们的兴趣是窑址外围发现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它们与汉代合浦郡治有密切联系。专家们无不兴奋地说，这是不经意的重大发现。

窑址外围发现的一处汉井也引起了专家的浓厚兴趣。这是一口直径1.7米，深3.9米的砖砌井，井壁全由汉砖错缝叠砌而成，最下面三层以竖砖丁砌。水井底部自下而上铺设木炭、竹木两层过滤结构，竹木上又覆盖一层石头。这口汉井砌法讲究，保存完整，还设计了木炭净水结构，应为汉代合浦郡生活区的饮水井。出土文物中，绝大多数为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也有米字纹、方格纹及方格带戳印纹陶罐、水波纹陶钵、瓦当、陶垫、陶拍、网坠等，出土的瓦当有云树纹和兽面纹两种。前者见于广州南越王宫署，后者尚未找到比对资料，但从质地和纹饰风格来看，也应是西汉前期之物。出土的筒瓦，唇口外卷，背面饰绳纹，里面为乳钉或布纹。板瓦背面，前部饰凹旋纹，后部饰粗绳纹，里面为乳钉或布纹，均是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典型做法。遗址出土大型板瓦宽达40厘米，且发现多件云树纹瓦当，应不是一般民宅所用，而是官衙建筑专用构件。根据上述考古发现推测，廉州镇草鞋村应是汉代合浦郡治的范围内。

在广西环北部湾区域内，汉代的城镇只见合浦郡治一处，当时的钦州、灵山、浦北等地都城属合浦郡广义性质的管辖，因人口稀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还不具备城市建设的条件。南朝至隋唐时期，城市的不断增多，表明了环北部湾区域在此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开发。现在环北部湾区域的城市布局，大体上是在隋唐时期的布局上发展起来的。就此而言，甯氏家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第二节 陶瓷制造业

环北部湾地区自汉代以来，陶瓷业就相当发达，上述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发

现的汉代早期烧造的大型板瓦、桶瓦等建筑用陶，其质量可与广州南越王宫署同类陶器相媲美。而在合浦汉墓群的地下，埋藏众多的陶瓷器就更能反映汉代环北部湾地区的陶瓷生产规模了。

合浦汉墓群主要分布在合浦县城东南郊的丘陵地带，东西长约 12.5 公里，南北宽约 5.5 公里，总面积 60 多平方公里。经勘探编号立标的汉墓有 1200 多座，而包括封土堆已消失而隐蔽于地下的汉墓总数则有近万座。合浦汉墓的葬俗趋同中原，主要在主室放置棺具，配置有成套的陶器以及青铜器，铁器组合、有部分墓葬随葬漆器、玉器和金银、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贵重器物。其中，汉墓中出土大量的仓、畜圈禽舍和五禽六畜等陶器模型以及男女陶侍俑，反映了该地区农业经济发达的事实，而史书说该地区“不产谷实”，而以商贩珍宝为主的经济结构应当重新审视。如果按每座墓陪葬 20 件陶器计算，那么埋藏在地下的陶器就有 20 万件，再加上大量的墓砖，可见合浦地区的产陶量是相当大的，不言而喻，该地区的烧陶技术也是很先进的。

南朝至隋唐时期，环北部湾地区的陶瓷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比较显著的是建筑用陶和瓷器制造。在甯氏家族统治时期，因为城市的增多和城市扩建，需要大量的建筑用陶，刺激了制陶业的生产。据考古调查发现，钦州县久隆隋唐钦江故城遗址、灵山县旧州隋唐南宾县县治遗址、浦北县泉水坡子坪村的越州古城址，都发现了隋唐时期的筒瓦、板瓦、莲花纹瓦当、兽面纹城砖等建筑用陶。当时的城墙头还没有使用陶砖，很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有限的缘故，但所有的墓葬都用陶砖砌筑墓室，可见陶砖的烧造数量也很大。

南朝至隋唐时期，环北部湾地区的瓷器生产也逐渐发展起来。瓷器是在陶器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使用相对粗糙的陶器到使用光洁细润的瓷器，是人类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也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具体表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早在商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学会烧造瓷器。就目前考古发现所知，广西地区最早学会烧造青瓷器是在战国时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中就发现有原始青瓷器陪葬。南朝至隋唐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瓷器已相当普遍，远远胜于使用陶器，表现在墓葬陪葬品方面是瓷器为大宗，陶器处于次要地位。

此时期，环北部湾地区不但发现有陪葬瓷器和窖藏瓷器，还发现有烧造瓷器的窑址。瓷窑遗址在合浦县山口镇英罗岭，规模相当大，当地人传说有七十二条窑。它背陆面海，窑址所处的岭脚下即是海滨，产品水运极为便利。目前窑址虽未发掘，但是瓷片堆积遍地皆是，可辨器形有四耳深腹罐、钵、碗、盘、坛等，釉色品种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等。用于陪葬的瓷器主要是在甯氏族人的墓葬中，已发掘的7座墓葬，共出土了130余件随葬品，其中青瓷器53件，陶器41件。窖藏唐代青瓷器发现于防城港市江山镇潭蓬村沿海。



图 3-11 钦江故城遗址地表遗存的唐代砖瓦

1982年10月间，潭东第一生产队社员唐成秀在潭东一队和潭东二队之间的山坳北侧山坡略上挖出青瓷碗一件、陶罐两件、印花青瓷残器一片。据挖掘者所述，青瓷碗覆盖于一陶罐之上，发现时碗底已露出路面，两罐相邻放置，周围土色稍黑，但未再发现其他东西。现场实地观察，出土地点附近的断面没有发现墓坑或其他遗迹。发现的青瓷碗，敞口，圈底，圈足，胎体厚重，较疏松，灰白色。器里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釉不匀，呈青黄色；釉厚处呈淡黄色，开细片，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口径18.8厘米，高7厘米、足径9厘米。印花青瓷器残片，现存为器物的一端，作花瓣形，平底，胎薄；内饰印花，胎厚0.20厘米；胎釉结合差，釉面已脱落；高3.8厘米。出土的六系陶罐与钦州隋唐墓葬出土的

陶罐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罐的腹部较匀称丰满。青瓷碗脱离了隋、初唐的敞口、深腹、小圈足的作风，趋向喇叭形，大圈足，且器形大而厚重，显然是唐代器物风格。



图 3-12 廉州故城遗址地表遗存的唐代瓦

尽管隋唐时期全国各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已倾向于使用瓷器，工匠们也多注重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制陶技术进步。但就甯氏家族而言，他们不但注重瓷器生产技术，同时也注重提高制陶技术，特别是在建筑用陶制造方面，是很有成就的。如上述所说的莲花纹瓦当，不但实用，而且纹饰逼真，栩栩如生，在隋唐时期的建筑陶制品中可称上品。如甯道务墓出土的墓志铭陶碑，高 90 厘米，宽 60 厘米，厚薄均匀，在上刻有 1400 余字，字体道劲有力，刀法流畅。陶碑出土时，碑体平整坚实，刻字刀锋清晰，没有漫漶模糊情况。制造这样大的陶碑，国内罕见，欲想烧成功必面临这样几个技术难题：其一是如何选择陶土制作碑坯？用普通的陶土是肯定不行的，用普通陶土烧制容易变形。其二，在什么湿度下刻字？在太湿的情况下刻字，水分蒸干，碑坯干燥收缩，字体易变形或断裂，在太干燥情况下刻字，又影响刀锋运行，达不到书法效果。其三，如何进窑装烧？如此厚重宽大的坯体，用什么搬运工具运送进窑床内？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陶碑的窑室是龙窑还是馒头窑，但不管是什么型式的窑，窑室内的不同位置都承受不同

的火候，碑坯放在何处才能烧透，这是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掌握的。根据陶碑出土情况，估计碑坯很可能是采用框架制作法。先用木板制好长方形框架，然后在框架里填充坯土，待干透到一定程度后再刻字。烧成之后，陶碑没有变形，说明坯土经过精选陶练。这样大的坯体能烧透，说明陶窑结构已相当科学，窑室内能保持持续的高温，窑工也能掌握好火候的分寸。

钦州甯氏家族烧制的陶瓷器，有部分造型皆与北方地区的同类器物差不多，但也有些器物很有个性。如钦州久隆甯氏家族 M6 墓出土了一件青瓷提梁壶。这件提梁壶，圆腹，平底，半环形提梁；提梁一侧肩上作直口短流，流内作算；通体施青黄釉，胎质灰白坚硬。壶通高 21.4 厘米，腹径 15 厘米，底径 12.5 厘米。这件提梁壶造型特殊，颇具地方特色。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这样型式的壶，当为钦州本地区的陶瓷工匠设计烧造。



图 3-13 隋唐甯氏墓出土的青瓷杯

隋唐时期，甯氏族家族烧制的陶瓷器，在造型上，往往仍留有南朝时期的遗风。甯氏族墓中的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盛行四横系罐、青瓷碗、青瓷杯等器物。

器体矮圆，施釉肥厚，釉青中泛黄，胎体有化装土保护，这些特点都带有南朝作风。隋唐时期岭内汉族陶瓷工匠烧造的陶瓷器，在造型上都趋向于瘦长，特别是罐、壶等器物肩上的横系，大都变成直竖式或者横竖式，目的是四系与瘦长的器身相应对称，更显得亭亭玉立。甯氏家族隋唐墓中出土的器物为什么都未具备这些时代风格呢？唯一的解释是：隋唐时期，岭北地区先进的陶瓷工匠们为适应社会需要，创造出新的器型（即隋唐瘦长型），而广西钦州地区因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对岭北新式的型器还未能接受，依然烧造旧式的陶瓷器型（即南朝的矮胖型）。

甯氏族家族烧制的陶瓷器，以实用器为主，很少见到冥器。出土器物中，青瓷器有碟、碗、杯、钵、瓶、罐、唾壶、提梁壶等，陶器中有罐、四系罐、钵、釜、带盖小孟等。这些说明，当时钦州烧制的器物主要是生活实用器，不像北方中原地区隋唐墓中常见的兵马俑、仪仗俑、镇墓兽以及其他专为墓葬而烧造的冥器。除烧造日常生活实用器外，在器物制作工艺方面，工匠们已掌握了用化装土保护胎体法（日本称化装土，我国称护胎釉，目下学术界倾向于用化装土名称）。



图 3-14 隋唐甯氏墓出土的青瓷盘

由于钦州一带瓷土不纯，多含有其他杂质，制胎时，胎表比较粗糙。如果这时直接施上釉，必须浪费很多釉药，而且还达不到匀称平滑的效果。工匠于是将比较纯净的瓷土研成粉末，用水调成浆状，然后在制好的器物坯体上涂抹，直至坯体表面呈平滑匀称，然后再施上釉药，其效果就比不上化装土的器物好得多。在器物装饰手法方面，制作者已娴熟地掌握了印花法。钦州久隆 M1 墓中出土了八件青瓷碗，这种碗的里心饰有蔷薇花等印纹。印纹图案系由多次加印组合而成，故有饰纹重叠现象。这种印花法操作过程大致是这样：先将蘑菇形的印模制好，晾干，然后在印模上雕刻蔷薇花图案，再入窑加温，使其坚硬。凡初做好的碗坯，未待干燥，即可用印模按印下去，图案就这样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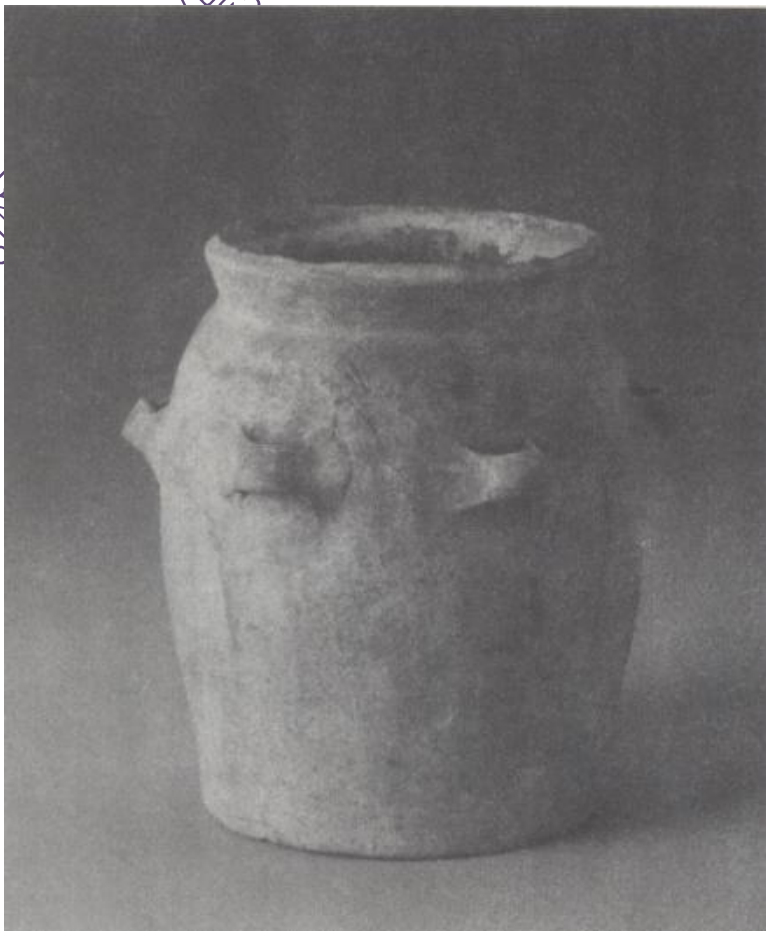


图 3-15 隋唐甯氏墓出土的四系罐

综观钦州地区在隋唐时烧造的陶瓷器，造型合理，施釉匀称，火候也掌握得好，说明这里的陶瓷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第三节 造船业

《隋书》卷五十六载：“时有甯猛力者……在陈日已据有南海。”这里所说的南海，实指北部湾海域。临水使舟，优越的地理环境为甯氏家族发展造船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钦州沿海的越民除制造采珠捕鱼等生产用船外，更主要的是为甯氏家族的水军制造了大量的军舰。隋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甯赞率本部水军随刘方渡海攻打林邑；又隋末，甯长真率本部越兵攻打丘和于交趾。两次战争都需要船舰把兵员运送过海。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船舰，欲把数千兵员以及军需运到大海彼岸那是不可能的。令人深思的是，隋大业元年攻打林邑国，刘方身为主帅，为何派甯长真等人从陆路进军，而自率水军从海上进军呢？这说明甯氏家族的水军所乘的船舰在海中比较安全，否则身为主帅且是不习水战的北方籍刘方，决不会轻易冒险乘船出海的。钦州一地所造的船到底有多大？有人站在钦州

海岸描述这里的船只时说：“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枪（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圈豕酿酒其中。”^[2] 据此或可知甯氏越兵船舰之一斑。

制造这样大的船只，必须要有好的木料。钦州海山出产一种奇特的木材，叫乌婪木，山树长五丈多，纹理缜密，用来做大船上的舵“极天下之妙也”。^[2]

大凡在海上航船，舵至关重要，可谓几十人的生命系于一舵。别地产的木材用来做舵，长不过三丈，若遇大风恶浪，往往折断。而用钦州海山产的乌婪木做舵，“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2]。正因为钦州有好的木料，再加上能工巧匠们的智慧，使甯氏家族的水军获得了良好的船只装备。但反过来说，也正是甯氏家族注重发展水军，钦州地区的造船业才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看，甯氏家族制造船的形式有独木舟、拼板船和楼船三种。

独木舟 独木舟是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可以认为许多原始民族都有可能独自发明、制作独木舟。制造独木舟要选择粗大的树干，直径1米左右或更大。在金属生产工具未出现以前，人们用石质工具加工粗大质硬的树木很不容易。因此，造舟时往往先把要保存的舟体用湿泥遮掩，然后用火烧烤及炭化要去掉的部分，再用石铤、石斧等挖凿。岭南地区出土的铜鼓纹饰中多有独木舟的形象，贵县罗泊湾 M1:11 号鼓胸的船纹就是一种独木舟，它首尾上翘，船上仅载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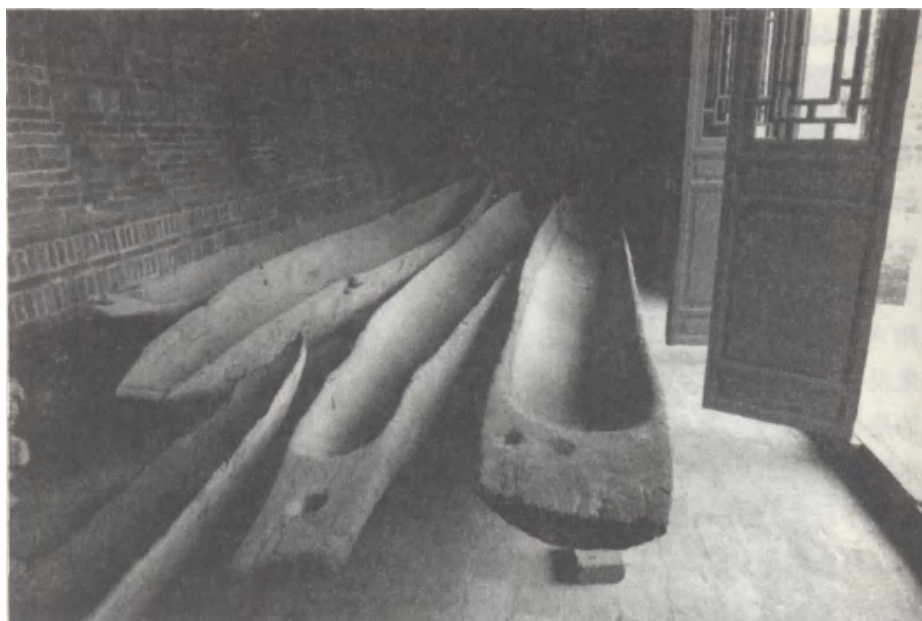


图 3-16 钦江出土的独木舟

目前我国已出土有 20 多只不同历史时期的独木舟，大部分是在岭南地区发现的。钦州市博物馆已收藏独木舟 6 只，是国内收藏独木舟最多的博物馆。这些独木舟都是在钦江流域出土。其出土地点分别如下。

1989 年 11 月，在广西钦州大寺三门滩河床挖出两条用巨木刳制的独木舟，其中一条长 11 米，宽 0.9 米，年代约为宋至元明时期。

1990 年，在广西钦州茅岭江打捞出两条独木舟，长度分别为 9.2 米和 7.8 米。

2007 年 10 月，在钦州钦江水域再次打捞出一条古代独木舟，长度 9.2 米，并共出周汉时期的双肩铜斧。据广西博物馆在法国进行的 C-14 碳化测定为约 600 年前的遗物。

2009 年 8 月初，钦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人员于钦北区大寺镇下缸瓦窑村征集到一条独木舟，这是钦州市博物馆在钦州市范围内发现的第 8 条独木舟，也是市博物馆收藏的第 6 条独木舟。这次出土的独木舟长约 13 米，最宽约 1.08 米，最深约 37 厘米。从实物来看，新收集的这条独木舟仍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其年代估计要早至隋唐时期。

此外，在钦州以外的岭南内河、沿海地区也有独木舟出土。

2003 年 3 月，广西合浦县南流江下游发现一条由两段独木舟前后拼接而成的扩展式独木舟的一段，残长 6.2 米，宽 1.05 米，船舷两侧留下了安装横杆的凹槽和捆扎绳索用的小孔。

1964 年，在贵县（今贵港）江南河滩出土过一条全长 4.7 米的独木舟。这条独木舟微上翘，头部左侧留出一小块方形耳，是停泊时系缆用的。这条独木舟内槽长 3.9 米，宽 0.5 米，深 0.3 米。底部平直，尾端稍上翘。这条独木舟做工粗糙，表面尚见留下的斧凿痕迹斑斑。据推测，其制作年代应在西汉以前。

1976 年广东化州鉴江堤附近，在同一地点发现东汉独木舟 6 条。独木舟系取一段巨木劈去一部分，局部火烧，逐次将中间挖空而成，出土时舟内还可以看到经火烧变炭后挖凿的痕迹。舟形如梭，两端窄，中间宽，首、尾微上翘。其中的 2 号舟全长约 5 米。另外，在广州西汉早期墓 M1048 中，出土过一只独木舟模型，

但已残腐，只存船底及旁板。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有岭南地区使用独木舟的情况，“广州江行小舟，皆剝木为之，有面阔六七尺者……而质厚迟钝，忽遇大风波，则不能翔，多至沉溺。要不若板船，虽善，不能为矣。钦州竞渡兽舟，亦剝全木为之，则其地之所产可知矣。海外蕃舶亦剝木者，则其为木何止合抱而已哉”。清人汪森所辑《粤西丛载》引明人魏浚《西事珥》说：“易翼称剝木为舟，今（广西）西方多有之。取大木长一丈，围五尺以上，虚其中，裁留首尾，若槽形，亦有昂首而锐其末者，广二三尺，所受四五人，或至六七人。村民用以往来乘载，小溪中无官渡之处，过往輿马则方舟而济。”由此可见，独木舟是一种常用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其加工容易，不会漏水，结构坚实，实用方便。文中如实地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唐宋时期，两广地区制造使用独木舟很普遍，广西钦州是独木舟产地之一。独木舟不但在内陆江河小溪内行驶，也可在海上行使，外国商人也有用独木舟运送货物到钦州来贸易的，但在海上航行的独木舟比较大。

令人感兴趣的是，考古发现的独木舟最多的是在钦江流域，这与甯氏族家族建造强大的水军，鼓励俚人发展独木舟运输业有密切关系。综观北部湾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治集团的水军能超越甯氏族家族的水军力量，而甯氏族家族的水军大部分是俚人构成。俚人自古以来就善造独木舟，他们平时用作摆渡、运输、赛神、捕捞等，战时则征为战艇，因为独木舟以整木剝成，壁厚坚实，操作灵活，速度快，作为冲锋舟是很有杀伤力的。这或许是钦江发现独木舟最多的原因之一。虽然钦江出土的独木舟有些是宋元以后的遗物，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正因为甯氏族家族在隋唐时期鼓励发展独木舟，才有以后历代独木舟的发展。

木板船 顾名思义，木板船是用木板拼合而成的船只，是继独木舟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有人认为由于独木舟的容量有限，人们开始在独木舟的四周加上木板，以增大容量，原来的独木舟就逐渐变成船底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独木舟是用整木制成，它的阔度、深度都受到树干的限制，装载能力不大。它比较浅，较窄，行驶不稳，易于翻船。随着生产、生活对水上运载工具的需求不断增加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木板船便应运而生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

圆底独木舟逐步变成了船底中线处通连首尾的主要纵材，即“龙骨”了，也就是演变成尖底或圆底的木板船了。而平底独木舟就逐渐演变成了平底木板船底中心线上的一块板。这时，事物起了质变，完全不同于独木舟的新船——木板船就出现了。

木板船原名“舢板”、三板，最简单的木板船莫过于“三板船”了。全船由三块板构成，即两块侧板和一块底板。底板的两端以火烘弯后向上翘，这也就是现代“舢板”船的祖先。

专家认为，制造木板船需要把圆木加工成木板，这是石质工具所做不到的，只有金属锯出现以后才有可能，因此推测中国最早的木板船出现在三千多前的商早期。商代甲骨文有“舟”字是象形字，它反映了早期木板船的出现及其结构和形态。在甲骨文中，舟字写法多样，形态多样，“舟”字中有二或三条横，表示当时木板船上纵横材料的安排方法。用横梁（横板）加强船体横向强度并形成了3~4个分段隔舱，它也能使船体纵向舷板的接头钉在横架上，用短板可以接成长板船。可知商朝的船只已脱离了独木舟阶段而进入木板船阶段了。直到近现代，广西一些狭窄而又弯曲的河流上，还能看到三板船之踪迹。简单的木板船用途很广，广泛用于日常劳动生活之中。广东佛山市澜石的一座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水田附船模型。模型是用陶制成，有大畦方正之水田，田中有五人在劳作，其中有扶犁耕作的戴笠陶俑。另有一人似用手牵一条木船。从船形态看，木船平底，首尾上翘，已有横梁分隔仓位，属简单木板船。

唐宋时期，钦州沿海地区的拼板船制造业也很发达，据《岭外代答》记载：钦州的船工在制作拼板船时，就地取材，很有经验。由于钦州与岭北距地遥远，且交通不便，造船所需用的铁钉、桐油之类物品非常缺少，当地的造船工匠们却能找出其他天然草木作代用品。造船时，船匠们将制好的船板钻孔，然后从山中找来藤蔓系束其间，这样板与板的隙缝很大，造好的船还能下水。他们又找来海中生长的一种名叫茜草的水草，晒干后，室塞进隙缝中。晒干的茜草，遇海水后，迅速涨开，船就不漏水了。

铜鼓上的多数船纹，首尾均上翘很高，载人较多，有的还用梢、橹，还有舵

和锚，应属于木板船范畴。广西贵县罗泊湾 M1:10 铜鼓上的船纹形态与其他的船纹有不同，它的首尾上翘而且各有二道装饰，船身有十余道宽狭不等斜行线用以连接两个船身。因此有人认为是两条并排，用横木相连的双身船。这种船和近代太平洋上的一些部落使用的双身船相似，是一种可抗击风浪，可在海上航行的船只。两只船并在一起称“舫”，《说文》称“舫，并舟也”，《索隐》中也说“舫，谓并两船”。由于舫的阔度是原船只的一倍以上，船宽则稳，载重量也大，因此受到重视。战国时张仪声称，秦楚虽相距三千余里，“但用舫船载士兵，一舫可载 50 人与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一天可航行三百多里，不足十日可达楚之边关”。《史记·酈生传》也说：“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到来，蜀汉的粮食用舫船装载着顺江而下。”这反映了在战国至汉初，舫是重要的军用运输工具。汉初南越国赵佗也应拥有较多的舫船。

甯氏家族的水军多次渡海作战，北部湾海面风浪大，没有平稳牢实的船艇是很难将兵员粮草运送到大海彼岸，这时候他们的水军中出现租用两船并成舫舟就是很自然的事。

楼船 《甯贇墓志铭》中说甯贇“拥以楼船五鹵”，还说甯氏家族水军拥有楼船，而且不在少数，多达二十余艘。

什么是楼船？楼船即是有楼之船，其大小不一，有两层乃多层的楼房。秦汉时期，楼船常用于军事，是水军中的主力船舰之一。因此，楼船有时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还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有的楼船上面有三个楼层，第一层叫“庐”，“像庐舍也”；第二层叫飞庐，即“其上重宝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叫飞雀，“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刘熙《释名》）。这三层，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矢石进攻的女墙，女墙上开有射击的窗口；为了防御敌人的刀枪火攻，有时船上还蒙上皮革等物。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为了征服南越国，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 40 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楼船高达十余丈，上面旌旗飘扬，气势极为雄壮。《汉书·食货志》说“粤欲与汉用船战”，由此可见南越国的战船和

水军具备相当规模和力量，有与汉军一战的能力，因此南越国水军也拥有和使用楼船。广西西林铜鼓上有搭起高台的船纹图像，说明广西西汉早期已有了建造楼船的技术水平。1953年广州东郊龙生岡汉墓，出土木船模型一件，结构虽散乱残破，但尚能辨识。此船甲板上建有重楼，船板都有彩绘，部分木板镂空雕刻；有桨十支，橹一支，可能是官方或富商豪强所用的楼船。

以上介绍的三种船只，在船只发展史上虽然有着先后的关系，但是，当一种新的船型产生后，并不意味着原先较落后的船型就会被淘汰，它们之间仍然有着并存的关系，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用途。

第四节 铜鼓铸造与使用

一、甯氏家族与灵山型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历史文物，目前我国各地文物部门如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铜鼓已有1360余件，其中广西占500余件，另外，在越南、缅甸、泰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也收藏有不少中国铜鼓。广西是世界上出土和收藏铜鼓最多的省（区）。对于众多的铜鼓，以往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比较杂乱。1980年3月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上，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用标准器来分类，将众多不同类型的铜鼓分为八大类型，并以出土地点来命名。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万家坝出土的一些铜鼓定名为“万家坝型铜鼓”，其年代为春秋时期。其后依次为：“石寨山型铜鼓”，以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汉代墓葬出土的一些铜鼓命名；“北流型铜鼓”，以广西北流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命名，其年代是从西汉至唐朝都在流行；“灵山型铜鼓”，以广西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命名，其年代是从东汉到唐代；“冷水冲型铜鼓”，以广西藤县濛江村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其铸造时间为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遵义型铜鼓”，以贵州省遵义市南宋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墓出土的铜鼓为代表，此类铜鼓发现太少，大约铸自唐代至宋代之间；“麻江型铜鼓”，以贵州省麻江县谷峒火车站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其铸造时间从宋代到清代道光年间；“西盟型铜鼓”，以云南省西盟瓦族地区现在仍使用的铜鼓为代表，其铸造年代为唐代中期到清末。其中，“麻江型铜鼓”传世数量最多，数

以千计，仅广西河池地区的民间就收藏有 1400 余面；而“西盟型铜鼓”铜鼓在中国传世很少，主要流传于东南亚地区。

灵山型铜鼓的分布中心主要是灵山县与及相邻的横县和浦北县。具体说就是六万大山西侧至郁江横县段两岸，在此范围之外，只有零星散布。就散布而言，东到广东省的高州；南到合浦；西到上思在妙、龙州武德，在越南谅山也有出土；北到桂平大洋。这个分布带正好处于北流型铜鼓分布区的西侧和冷水冲型铜鼓分布区的南部，也是南朝至唐代乌浒人和俚、僚人的分布范围。灵山型铜鼓的分布范围恰好是甯氏家族的统辖区域，北流型铜鼓则是冯氏家族统辖区，因此灵山型铜鼓被称为甯氏铜鼓，北流型铜鼓则称为冯氏铜鼓。



图 3-17 灵山型铜鼓

灵山型铜鼓的特点为：鼓面边沿伸于颈外较少，没有垂檐。胸腰际附带状形扁耳。纹饰非常精美。鼓面环行六只三足蛙；有的为六只累蹲三足蛙；有的三只累蹲蛙；三只单蛙相间。鼓面三弦分晕，但是也有不少二弦晕，晕距很密。鼓面鼓身各有三道较宽的主晕，是为骑兽纹、鸟纹、鸟形纹、螳螂形纹等。主晕外又有四出钱纹、虫纹、席纹、四瓣花纹，边沿饰以蝉纹。灵山型铜鼓共有有 72 件散藏在全国各地。据 1980 年调查统计：北京 5 具，上海 4 具，江苏 2 具，湖北 1 具，湖南 3 具，广东 15 具，广西 41 具，四川 1 具。这些数据指的是收藏于国家

文物单位的数据，实际上在钦州、灵山、合浦等地的地下仍藏有不少灵山型铜鼓。1980年以后又有不少早期灵山型铜鼓出土，现介绍如下。圭壁鼓 1988年在广西横县板露乡圭壁村出土，面径118厘米，身高64厘米。面有4只单蛙和2个累蹲蛙，鼓面中心太阳纹12芒。

六龙鼓 1993年2月在广西玉林市沙田乡六龙村莲塘坪十五塘冲出土，面径最宽处133.5厘米，通高73厘米。鼓面中心11芒。

宁屋山鼓 1984年在灵山县旧州镇青松村宁屋山出土。面径82.4厘米、身高50.3厘米。面有六蛙，顺时针排列。太阳纹10芒。

鹿跳山鼓 1987年灵山县旧州镇长基村尚坪鹿跳山出土。面径82.5厘米、通高53.2厘米。面有六蛙，逆时针环列。太阳纹8芒，主晕是变形羽人纹。

以上出土的几件铜鼓年代较早，都是东汉至南朝时期，此时期的当地少数民族被称为乌浒人，因此有些学者又习惯称这个时期的灵山型铜鼓为乌浒铜鼓。进入隋唐以后，当地少数民族又被改称俚人或僚人，此时期的灵山型铜鼓又被称为俚僚铜鼓。甯氏家族在史书中常被叫做“俚僚酋帅”即来由于此。隋唐时期的灵山型铜鼓属于中晚期铜鼓。1980年以后也有发现。

乐彩鼓 1982年11月在灵山县石塘镇红星村乐彩屯出土。面径87.8厘米、通高52厘米。面有6蛙，3只单蛙和3只累蹲蛙相间逆时针环列，蛙背饰螺旋纹。面有太阳纹12芒。二弦分晕，主晕饰变形羽人纹。鼓耳一侧铸有一小鸟形象，鼓胸内壁铸有一水牛形象，鼓劲面背部有扇形调音刮痕。

白木鼓 1986年三海镇白木村出土。面径104.4厘米，通高63.4厘米。面有六蛙，3只单蛙和3只蹲累蹲蛙相间逆时针环列，太阳纹10芒，二弦分晕，晕间饰兽形纹、鸟形纹等。一侧耳下方铸有双羊形象。

猫岭鼓 1986年6月1日在灵山县丰塘镇大丰村猫出土。面径100厘米，通高59.5厘米。面有6蛙，3只单蛙和3只累蹲蛙相间逆时针环列，太阳纹10芒。一侧耳下有一对鸟塑像。

六颜村鼓 1987年灵山县丰塘镇六颜村出土。面径81.4厘米，通高50厘米。面有蛙六组，皆累蹲蛙逆时针环列，蛙背有螺旋纹。太阳纹10芒。鼓胸内部铸

有一累蹲蛙塑像。

博白城郊鼓 1986年在广西博白县城郊区出土。面径77厘米，通高46.2厘米。鼓面有立体蛙6处，其中3处是大蛙背小蛙，另外3处是青蛙背田螺，皆逆时针环列。太阳纹10芒，晕间饰变形羽人纹、兽形纹等。一侧鼓耳下方铸有一对立体鸟塑像^[3]。

甯氏家族的兴衰与灵山型铜鼓的消亡有直接关系。一般认为，灵山型铜鼓是从冷水冲型铜鼓发展来的，因此推断它的最早年代为东汉中期，与冷水冲型的下限时间相衔接。而灵山型铜鼓的下限时间问题，则是有考古学材料做证据。1962年2月在灵山新圩镇绿水村山坡上出土一面灵山型铜鼓，鼓劲腔内残存的泥土中有一枚唐“开元通宝”铜钱。这面鼓面径81厘米，通高49厘米。胸腰际有羽纹扁耳两对。面沿逆时针环立同心圆三足蛙6组，3只螺蹲蛙间以3只单蛙。三弦分晕。鼓面15晕，中心太阳纹10芒。鼓面、鼓身晕间均施四出钱纹、四瓣花纹、虫形纹、骑兽纹、龙形纹、羽人变形纹、斜方填线纹、蝉纹等。鼓身还饰有席纹。鼓身内壁有二弦分晕的8晕花纹，有鸟纹、四瓣花纹、四出钱纹等。是灵山型晚期有代表性的铜鼓。这面铜鼓在入土之前，应当说曾使用过，使用的社会功能也应有权力、财富、神器的作用。但在埋入土中之时起，它的社会功用只有神器一项了。据现代的民族学材料所知，将铜鼓埋入土内，一般是镇邪祛灾，人们将铜鼓视为神器，希望它能永远镇住妖孽，保佑人们的安宁。而作为权力、财富的象征是不会将铜鼓埋入土中的。据此可知，绿水村铜鼓是灵山型铜鼓的下限时间是可信的。

南朝至隋唐时期，钦州一地是俚僚人民聚居地。史书多称甯氏家族为俚僚酋帅。灵山型铜鼓出土地点均在俚僚人民居住地域内，鼓当是该地区俚僚所造。然而非常巧合的是，灵山型铜鼓最早制造年代是东汉，南朝至唐朝初年是它的成熟时期，其消亡时间是在唐朝年间，正好与甯氏家族在钦州一地的兴衰史相互一致。

灵山型铜鼓为什么伴着甯氏家族的兴衰而兴衰呢？我们认为，这与甯氏家族入乡随俗、崇尚当地俚僚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铜鼓在俚僚人民中间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甯氏家族世为俚僚酋首，其兴盛时期的甯猛力、甯长

真曾率领数千俚僚部兵南征北战，如果不“鸣此鼓以集众”，必然违反俚僚人民的意志，“到者如云”是不可能的。铜鼓既是甯氏家族统治俚僚人民的权威之物，那么甯氏家族提倡铸造铜鼓就是意料中的事了。这就是灵山式铜鼓兴起于东汉、南朝，盛于隋至唐初，消亡于唐中期以后的缘故。

至于说灵山型铜鼓随着甯氏家族的衰落而衰落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广州都督周仁轨率2万人来钦州把甯氏家族剿灭殆尽，唐皇朝强化了对钦州的统治地位，再不允许甯氏家族拥有自己的武装部兵，甯氏族人流散于民间，失去了世袭钦州豪酋的地位。这样原来作为酋帅权威地位象征的铜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逐渐走向衰落。

二、甯氏家族与铜鼓权力功能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盛行“北鼎南鼓，都是权力、财富的象征”说法。

“北鼎南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岭北地区的汉族以鼎作为权力、财富的象征，所谓“钟鸣鼎食之家”就是这个意思。而岭南地区的瓯骆、乌浒、俚僚民族则以铜鼓为权力、财富的象征，“有鼓者号为都老”，就是说只要拥有铜鼓就拥有权力、财富。北方的铜鼎已消失两千多年，南方的铜鼓至今仍在使用，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二是说在岭南地区也有“北鼎南鼓”的历史分界，即是以红水河为界，在河以北者是铜鼎流行区，在河以南者为铜鼓分布区。目前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加会秧家的一座春秋晚期墓中最早发现铜鼎。该墓共出土33件青铜器，按用途可分为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车器和生产工具共6类。铜鼎属于烹饪类，共出土5件。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也出土铜鼎12件。1977年在宾阳县甘棠乡韦坡村发现的两座战国墓，其中1号墓出土铜鼎1件。这是广西发现的铜鼎最南的地方。就目前考古发现情况看，早期铜鼓多发现于右江河谷流域，这些地方正是骆越方国统辖的地方。最早发现铜鼓是在田东县祥周乡甘莲村附近的锅盖岭战国墓内，1977年曾在此清理两座战国时期的墓葬。1号墓位于岭的顶部，共出土青铜器8件，其中有石寨山型鼓两面，另外还有铜剑、铜矛、铜戈、铜斧、铜叉形器。2号墓位于岭的西坡，除部分青铜外，还有玉块、玉环、玉管等装饰品。1993年3

月，广西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联合小学大门前南哈坡发现一处墓葬。出土铜鼓2件、铜簪1件，还有铜望钉、玉管、玉块、玉钏等。所出铜鼓是原始形态的早期铜鼓，属万家坝型。1994年6月，广西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挖到一面铜鼓，确定是一座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墓葬，同出一件精美的铜甬钟。另外在贵港罗泊湾、西林县普驮汉墓葬中都发现有铜鼓。而零星出土铜鼓地点则遍布红水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岭南地区“北鼎南鼓”的分界是有历史原因的。秦汉以前，广西境内有两大方国，红水河以北为西瓯国，红水河以南为骆越国。西瓯以鼎为权力象征，骆越则以铜鼓为权力象征，主要取决于两者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西瓯方国与楚国为邻，而此时的楚国已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常有“问鼎中原”之举。西瓯方国受楚国用鼎制度之影响，因而也在方国内部用鼎“明尊卑，别上下”，以示统治阶级的等级差别。骆越方国偏在南部地区，欲与楚国交往则中间隔着西瓯方国，受到很大的制约，只能向西向东发展。铜鼓最早起源于云南高原的滇越方国，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学会制造铜鼓；战国时期，石寨山型铜鼓已相当成熟。田东发现的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铜鼓应当来自云南高原的越人方国。当时的滇国已处于较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并以铜鼓为最高权力重器。骆越方国与滇方国高层交往中，获赠铜鼓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而也就受滇人用鼓制度影响，铸铜鼓用作权力重器。

甯氏家族来到定州、钦州做统治行政长官时期，正是俚僚民族铸造铜鼓和使用铜鼓最盛行的时期。对此，《隋书·地理志》有明确的记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难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自称蛮夷大长老、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例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这段文字重点说明三个问题：其一，隋唐时期岭南俚僚民族铸铜鼓蔚然成风，鼓体铸得很大；铜鼓落成之后，还要举行隆重的祭鼓仪式。俚僚铸大鼓的情况，在考古发现中已得到证实。在我国八大类型铜鼓中，北流型铜鼓形体最大，其次为灵山型铜鼓。其二，铜鼓具有号令征伐的功能。若有战事，凡听到鸣铜鼓的声音，到者如云，人人都要上战场，为捍卫部族利益而战。其三，拥有铜鼓者才能当首领。一般人没有铜鼓，也不能使用铜鼓，只有首领、头人才能拥有和使用铜鼓。“有鼓者号为都老”就是这个意思。《隋书》对“都老”的理解有些误会，认为“都老”是从南越王赵佗的自称演变而来。汉初，赵佗在广州建立南越国，汉皇朝派使臣来与他谈判，他对汉使臣自称为“蛮夷大长老”。《隋书》作者认为，越人讲汉语不清楚，将“长老”说成“倒老”，以后又说成“都老”。其实“都老”本是古越语，现在越人后裔壮族语言中仍有“都老”一词，新中国成立前龙胜龙脊十三寨仍有“都老”制，其意思都是头人、首领。

俚人铸造的铜鼓，以体形硕大而闻名于世。为什么要制造如此硕大的铜鼓？《广州记》里说得明明白白：“鼓唯高大为贵。”就美学的角度来说，即是重量与力量的美。铜鼓从质地到纹饰都充分体现了重力的美感。鼓的全身皆为青铜所铸，金属比其他物质都重，这是古人以至今人的直观就可以感觉出来的；而铜鼓的装饰花纹，是圆的反复出现，从小的、密密麻麻的云雷纹圆圈形式到布满鼓体的晕圈，还有那嵌置鼓面中心的圆饼形的太阳纹光体，显然都具有重力之感。因为在艺术形式表现中，圆体是给人以稳重深沉的美感。那一道道晕圈，就像银丝铁线将鼓身箍紧勒实。前面所讲到的“铜鼓王”，面径165厘米，如果没有晕圈的艺术处理，那薄薄的鼓面必然给人以轻薄易碎的感觉，而配上那突起的弦纹晕圈及各种浮雕立体纹饰，轻薄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鼓唯高大为贵”，并不是单纯追求形式的美，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意识根基和浓郁的宗教意味。我们先来了解铜鼓的出土情况。据历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情况，铜鼓往往是在水中或半山腰中发现。铜鼓为何多沉没于水中和埋藏于山上，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镇水妖和山妖。既是镇妖之物，必需有一定的重量，以显示其庄严威慑的力量，使人相信必能将妖怪镇住。这就是“鼓唯高大为贵”的根

本原因。它缘起于宗教的意念。铜鼓作为统治者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象征出现，鼓体越大，说明拥有者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财富越多。铸造铜鼓要有经济基础，一般平民铸造不起，只有统治者才能铸造。铜鼓作为神物，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功用，同时也是统治者权力的物化。现实中的统治者享有特权，作为统治权力化身的铜鼓必然也要铸得高大以示威严。这也是“鼓唯高大为贵”的文化内涵之一。

目前我们不知道甯氏家族有多少人，但从他们渡海攻打林邑，北上征伐高丽的情况看，其部兵应有数千人。这数千人中必有七成以上是俚人，这些俚人都是崇尚铜鼓的，所以，甯氏家族借助铜鼓的权威来统治俚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甯氏家族击铜鼓指挥打仗的事在文献中没有记载，但甯氏家族曾统领过西原蛮部兵击铜鼓与唐朝军队作战的事，却在唐朝著名诗人李贺的《黄家洞》诗中反映出来。其诗云(见《全唐诗》4-447)：

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
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箛。
彩巾缠踣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
山潭晚雾吟白鼉，竹蛇飞蠹射金沙。
闲驱竹马缓归家，官军自杀容州槎。

黄家洞，也就是“西原蛮”，也有叫“黄洞蛮”的，是以今大新县到扶绥县为中心的左江流域俚人，也就是原先的骆越人和后来壮族的先民。隋朝及唐朝初期，曾受甯氏家族管辖。唐朝中期以后，甯氏家族势力消亡，黄洞蛮兴起，反抗唐皇朝的残酷压迫达100余年。这首诗是描写黄洞蛮与唐朝官军作战的诗，其背景是黄洞蛮从钦州地区北征至湖南永州与唐朝官军作战的战场。全诗以黄洞蛮人欢快、轻松的心情，胸有成竹地面对战争，以及赢得战争来讽刺官府战败后杀害当地无辜百姓的腐败无能。全诗从正面来描写了早年甯氏族家族率领俚人击铜鼓和唐朝官军交战的情景，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因此这里有必要将全诗作一番解释。

“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雀步，鸟雀跳跃般的步伐，表示欢欣、兴奋的情绪；蹙(cù)，踏、踩，蹙沙，踩着沙地。这两句的意思是：(黄洞

蛮)就要与唐朝官军交战了,他们并没有什么惧怕的心理,反而很兴奋。他们用鸟雀跳跃般的步伐,轻松愉快地奔向战场;他们急速地行军,脚踩在沙地上发出“促促”的响声。他们的武器非常原始简陋,是那四尺长的角弓和用青石磨制的箭头。

“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箠。”黑幡,黑色的旗帜;箭箠,装箭矢用的袋子。黄洞蛮崇尚黑色,用黑布做旗帜,用青铜铸成的铜鼓是随军的战鼓。他们用摇旗和击鼓发布命令。摇旗三下,人们当即敲击铜鼓,发出如雷鸣般的震响。看到旗帜和听到鼓语,黄洞蛮的将士们居高临下,顿时像猿猴一样呼叫,用力摇动着盛满箭矢的袋子,以此来振奋士气,表现他们斗气十足以及必胜的信念。

“彩巾缠踠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踠,((《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海》《词源》均无此字,不知何解,可能是腿。)看来战斗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在一处风景秀丽的溪水边停顿下来做战前准备工作。诗人才看清了黄洞蛮将士们的着装:他们的腿上斜绑着彩带,大家聚集在溪边,与葛草花的紫红色相映成趣。绑腿打成斜折形状,彩带与葛草花相互映衬,他们就像在萧瑟的秋天开放的葛草花一样,绚丽灿烂。

“山潭晚雾吟白鼉,竹蛇飞蠹射金沙。”战争是残酷的,但诗人不愿将残酷战争写在诗中;这场战争又是以官军惨败告终,他不忍将此事实表现在诗中,而是用比喻手法隐示着战争的残酷。说山洞有一深潭,晚上云雾缭绕,伏在水下的白鼉不停地鸣吼,含沙射人的鬼蜮出没其中,竹蛇、飞蠹等毒虫遍布洞中。借洞中毒蛇、野兽的凶猛来渲染战争的残酷紧张气氛,自然地引出最后两句的战争结果。

“闲驱竹马缓归家,官军自杀容州槎。”竹马,儿童用作当马骑的竹竿;槎,砍,竹木排。这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极具讽刺意味。写打完仗后,黄家洞人悠闲地骑着竹马,如同玩耍般地回家了。而官军战败后,却屠杀容州的无辜百姓以向朝廷邀功请赏,并把被砍杀的平民尸体丢下河中,就像浮排一样。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无情地鞭挞了官军的腐败与无能。

这首诗的作者李贺(790~816年)字长吉,青少年时即因才华出众而名动京

师。但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晋肃”，需要避讳，所以他一辈子不去考进士（因为晋、进同音）。当时就连大文豪韩愈也觉得可惜，替他抱不平，特地写了《讳辩》上呈，并鼓励李贺应试，但他始终没有付诸行动。李贺一生愁苦抑郁，体弱多病，只做过3年奉礼郎，27岁就死了，留下了200多首诗，被后人称为“诗鬼”“鬼才”，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三李”。他最有名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出自其《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曾被毛泽东引用，并在后面加了一句“人间正道是沧桑”，真正成为千古绝唱！这首《黄家洞》诗，好像是李贺亲临其境似的。但是，从他体弱多病、年轻早逝的情况看，他似乎没有到过广西，其行迹仅限于长安和洛阳之间。那么，他是凭什么写出这首诗的呢？可能是听到或看到别人的述说，加上他丰富的想象力而写成的。因为李贺的诗，意境往往带有很大的想象成分，常常超越时间和空间。但是，即便如此，这首诗的真实性仍然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符合岭南俚人的风俗习性。铜鼓在黄洞蛮中具有征战的功能，黄洞蛮又曾是甯氏家族的部兵，当年甯氏族人率领这些部兵南征北战时，必然也带着铜鼓作为战鼓，以指挥部队作战。

第五节 煮盐业

《读史方輿纪要》卷二零四在评论合浦地势时说：“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之藩篱，控蛮獠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文中的“珠官”“盐池”，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合浦一地的经济命脉。广西内地没有盐井，食盐全靠海盐。“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①据统计，广西一地每年需用食盐量：“静江（桂林）岁额八千融（融安、融水）二千七百箩、宜（宜山）四千三百九、邕（南宁）七千五百、宾（宾阳）二千五百、柳（柳州）三千五百有奇、象（象州）三千、横（横县）二千七百、贵（贵县）三千一百有奇、郁林（玉林市）三千、昭（昭平县）三千九百、贺（贺县）五千、梧州二千、藤（藤县）二千五百、浔（桂平）三千、容（容县）三千，凡八千二百箩。”^[4]八千二百箩的食盐全部由合浦沿海盐场供应。

合浦煮海为盐，历史悠久。据《南齐书·州郡志》载，南朝齐时，越州设有

盐田郡，可见当时在这里从事煮海为盐的盐民必定很多，因而特设盐田一郡来加强管理，征收税赋。盐田郡在合浦的什么地方？据《清一统志》载：“石康废县：常乐州元（原）领石康、博电、零绿、盐场四县，开宝五年废州，并博电、零绿、盐场三县为一县。”南齐时的盐田郡当是南汉时的常乐州盐场县，宋时的石康仓所在地。隋唐时甯氏家族甯宣为合浦太守，这里的盐田生产都归甯氏家族管理，盐业管理应由甯氏家族掌控，盐田赋税一任他们征收。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食盐的来源有湖盐、岩盐的天然晶粒，也可以通过“煮海为盐”或者井盐来获得固体的食盐，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工晶体的制备。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学会生产食用盐的国家，最早生产盐的技术是“煮海为盐”。“煮海为盐”的生产技术产生于甯氏家族的老家——山东。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我国食盐生产的起源情况，然后再讨论甯氏家族如何在环北部湾地区推广食盐生产技术的问题。

我国“煮海为盐”由来已久。《世本》中有“夙沙氏煮海为盐”“宿沙氏始煮海为盐”的字句。《吕氏春秋·用民篇》也有“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的记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自战国、汉、唐至宋流传很普遍。夙沙氏（也有称为宿沙氏）是什么人？一种说法是黄帝的臣子，一种说法是炎帝的诸侯，一种说法是“夙沙瞿子”。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确定夙沙氏是黄帝臣子还是炎帝的侯国或是夙沙瞿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夙沙氏是一个长期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古老族群，和传说中的洪荒时期的炎帝部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推论，夙沙族群长期与海为邻，不仅首创了煮海为盐，而且大约在商、周之际就已在当地推广和普及用海水煮盐的技术。

关于夙沙氏煮海的故事，在我国民间长期流传一个美丽动听的传说：相传在非常远古的时代，在山东半岛南岸胶州湾一带，住着一个原始的族群，族群里有个人名叫夙沙，聪明能干，膂力过人，善使一条用绳子结的网，每次外出打猎，都能捕获很多的禽兽鱼鳖。人们就选夙沙当他们的首领。从此，所有这个族群的人都以他的名字为姓，整个族群被称为夙沙氏。夙沙氏族群以渔猎、狩猎为主要经济来源，同时也进行采集和从事一些原始农业生产以补充食物之不足。

有一天，夙沙在海里捞到几条小鱼，便在海边架起几块石头作灶，准备煮鱼。他和往常一样提着陶罐从海里打半罐水回来，刚放在火上煮，还来不及把鱼放进罐里，突然一头大野猪从眼前走过。夙沙一见，异常兴奋，这可是夙沙氏全体族人两天的食物呀。他带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拔腿就追，追了很久的时间才捕住那头野猪。等他们扛着死猪回来时，罐里的水已经熬干了，只见罐底留下了一层白白的细末儿。夙沙不经意地用手指沾点白末儿放到嘴里尝尝，发现白末儿味道又咸又鲜。夙沙用它就着烤熟的野猪肉吃起来，味道好极了。那白白的细末儿便是从海水中熬出来的盐。从此以后，夙沙氏族人就学会了煮海水取盐的技术，并在煮熟的食物中撒入少许盐吃用，不但使食物味道新鲜，也增强了体质力量。

后来，人们相信夙沙是用火煎煮海水制盐之鼻祖，尊崇其为“盐宗”。在宋朝以前，在河东解州安邑县东南十里，就修建了专为祭祀“盐宗”的庙宇。清同治年间，盐运使乔松年在泰州修建“盐宗庙”，庙中供奉的主神即是煮海为盐的夙沙氏，商周之际运输卤盐的胶鬲、春秋时在齐国实行“盐政官营”的管仲，置于陪祭的地位。

甯氏家族来到环北部湾地区时，这里一直采用直接煎煮海水成盐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比较落后，不但费工费时，且盐产量很低。因为直接煎煮海水成盐是很不容易的。海水含盐量不多，根据对三大洋的77处海水取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海水含盐量是3.5%左右。为此，要取得1千克盐，必须要加热蒸干大约28千克的海水。

到了唐代，甯氏家族对传统的煮海水成盐的工艺技术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将煮海水成盐工艺改成日晒制盐法。日晒盐法有两种，一种是晒沙淋卤煮盐法，另一种是晒水淋卤煮盐法。粤西盐务管理局的林树涵先生曾提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有三次重大技术革新”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次技术革新是改直接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成盐，这种制盐技术始于唐代的广东和江淮地区。第二次是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利用阳光和风力制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此项技术是宋朝时期福建和广东地区开始的。第三次是更充分地利用日光和风力进行制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把浓厚卤引入结晶池再晒卤成盐，

从而完成“天日制盐”。此法始于明朝的福建省。^[5]

唐代岭南地区的晒沙淋卤煮盐法技术革新的出现，是经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初级阶段是野盐生产工艺。唐朝人刘恂《岭表录异》对野盐生产工艺有较详细的介绍：“但将人力聚咸池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篁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用竹盘煎之，顷刻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篾表里，以牡蛎灰泥之。自收海水煎盐之，谓之野盐，易得如此也。”文中所说的制盐法也叫海潮积卤法，虽然设施简陋原始，但所取得的盐水浓度相当高，且煎煮也极为省工省资。晒沙淋卤煮盐法是在“野盐”法的技术基础上改进提高发展起来，其产盐效益明显提高。其方法是在港汊的浅滩上，修筑低矮的简易基围，将围内的沙幅（亦称沙田）整平耙松，引入海水浅晒，干后再引海水再晒，如此反复数次，沙子经海水反复浸泡晒干，盐分积累增多，然后将盐沙耙起收集，置于竹编的漏床上，淋上卤水，滤出更高浓度的卤水，达到饱和时，即放入大锅内煮，从单口锅煮发展到6~7口锅的连灶熬煮成盐，沥干后便可食用。

从直接煮海水成盐到晒沙淋卤煮盐是我国制盐技术上的第一次革新，其对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使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为什么制盐技术的第一次革新发生在含环北部湾在内的岭南沿海地区（该地区原属于广东管辖）？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制盐技术的第一次革新发源于岭南的具体地点，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是甯氏家族来自“煮海水为盐”发源地——山东，他们对煮盐技术是很熟悉的，或许们当中就有不沙盐工。为了发展经济，在甯氏家族组织领导下，制盐技术不断革新当在意料之中。

第六节 采珠业

甯氏家族统治钦州期间，非常注重环北部湾沿海经济的开发。这里的经济命脉主要是采珠业，因而格外受到甯氏家族的重视。《新唐书》：“武德六年，（甯）长真献大珠，昆州（今柳州市）刺史沈逊、融州（今融安县西南）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甯长真把大珠作为地方特产朝贡唐朝廷，他们平时必然驱赶珠民入海采珠。积累财富，献宝邀宠。而这

也从另一方面刺激了环北部湾地区采珠业的发展。唐朝时期，甯氏家族辖区内的合浦郡专设有珠池县，从行政建制上加强了对采珠业的管理，促使环北部湾海域的采珠业有序发展。

一、甯氏家族与珠池县

甯氏家族在合浦地区设置珠池县，加强对环北部湾海域采珠业的有序管理，与现在每年实行的北部湾海域休渔制度有同样的作用，是社会进步，保护环境生态的重要举措，也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总结。

环北部湾采珠业历史很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当地越人就在北部湾海域采珠，并向商周王国进贡。《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另外，同书中还提到商代初年南方贡品中有“仓吾翡翠”，“路人大竹”。上述瓠、邓、桂国、损子、产里、仓吾、路人等，都是今湖南及岭南地区的越人方国。所献的“珠玕”也就是珍珠。《楚辞·七谏·谬谏》王逸注：“圆泽为珠，廉隅为玕。”可知圆润光泽的叫“珠”。不圆的就叫“玕”，二者的形成完全相同，只是形状有所区别而已。这些“珠玕”，当是北部湾海域所采集。商王朝与四周诸侯方国的关系是一种臣服称首的关系。《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来王”即是来朝见商王以表示臣服；“来享”即向商王纳贡，纳贡之后，商王还有价值几倍于贡物的赏赐。所以纳贡是双方的享受。这两句诗前均有“莫敢”二字值得注意。“莫敢不来”，就是不敢不来，口气相当强硬。不来的后果将是大兵压境，身死国亡。商人对西北的氐羌如此，对南部的瓠、骆、桂国也必然如此。

在三国孙吴以前，北部湾海域的珍珠采集业管理比较松散，都是由地方行政长官具体负责，珠民可随意出海采珠，上岸后自由交易，很多珠民不事农业，专以采珠养家糊口。采珠是很不容易的，据载：“珍珠在数十丈深水中，取之必以长绳引而碓人下，气欲绝则擎动其绳，舟中人疾引而出，稍迟则七窍流血而死，或为恶鲨所噬。珠民没水多葬鱼腹中，或绞绳上仅手足存耳。”拿绳子缠人潜入深海采珠，到拉上来时只见残存的手或脚，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到合浦当官的，很多人都满载而归。那些到合浦经商者也都富得流油。西汉汉成帝时（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有个人名叫王章，家境非常贫寒，后来做了京兆尹，因刚直敢言，得罪了当权的王凤，被王凤弹劾以大逆罪下狱，其妻子八人也不能幸免，连累坐牢。不久，王章病死狱中，妻子家属全部流放边远的合浦，家产全部没收充公。王章妻子来到合浦后，发现做珍珠生意很有商机，便带领全家在合浦经营珍珠生意，很快就发了起来，积蓄财产数百万。后来王章家属遇赦，返回故乡，得以赎回田宅，安享生活。

东汉时合浦珍珠业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可是由于濒年滥采，珍珠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发生了著名的“合浦珠去”和“合浦珠还”的故事。据《后汉书·孟尝传》载：“（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止，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由这段记载来看，在孟尝任合浦郡太守前，合浦珍珠业已相当兴盛。但由于采捕无度，破坏了珍珠的生态环境，才出现了“合浦珠去”的局面。孟尝到任后“革易前弊，求民病利”，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使合浦珍珠得到了保护和繁衍，于是“去珠复还”。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戏剧家、诗人田汉到合浦访白龙城址，谈采珠旧事，曾作诗曰：“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曰珠民重可悲。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访古喜逢歌剧队，布帷丝幕白龙湄。”这些洋溢着真情实感的诗句，留下了他对“珠还合浦”的深切怀念。

到了三国孙吴时期，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孙权为了加强对北部湾采珠业的管理，于黄武七年（公元228年），将合浦郡改为珠官郡，设珠官太守一职。海南岛原来有珠崖县，也是因为产珍珠得名，此时并入合浦郡管辖，并在辖区内设有珠官长、珠卢长等县级行政机构，专门管理该地的采珠业。到了孙亮（公元252~258年）时，仅24年的时间，又将珠官郡恢复为合浦郡建制，个中原因很可能是官方过度垄断采珠业，致使珠民陷入贫困不堪的生活，遭到当地越人反抗的结果。

珠官郡的撤销，又使北部湾海域的采珠业进入相对无序采集的境况。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在合浦郡境内另设珠池县，但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又将珠池县撤销，仅存在六年的时间。撤销珠池县的原因，大概与孙吴时期撤销珠官郡的原因相类似，都是官方集权高度垄断采珠业，逼迫当地的俚人生活陷入绝境所导致。当时的合浦郡主要是甯氏家族任行政长官。南朝陈时，甯猛力派他的弟弟甯暄带了一部分族人去开发和管理合浦地区，隋至唐初，甯暄一直任合浦太守。到唐高祖武德初年（公元618年），才由他的儿子甯纯袭任太守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设珠池县，贞观十二（公元638年）年撤销珠池县，都是在甯纯任太守职期间，设置和撤销珠池县应当与他有重要关系。从总的层面看，甯纯要求设置珠池县与孙权设置的珠官郡是有所区别的。孙权置珠官郡是大面积禁止珠民私自下海采珠，进行高度的官方集权垄断珠业收入。而甯纯仅是在珠池范围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

我们现在有必要了解什么是珠池。唐朝刘恂在《岭表录异》书中诠释说：“珠池，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池虽在海上，而人疑其底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6]从文中可知，珠池就是采珠的海域和附近的岛屿，并不是在陆地上。北部湾海域有多少个珠池，历代有不同的说法。北宋张师正在《倦游杂录》书中说：“《岭南杂录》云：‘海滩上，有珠池，居人采而市之。’予尝知容州，与合浦密迩，颇知其事。珠池凡有十余处，皆海也，非在滩上。自某县岸至某处，是为某池。若灵渌、囊村、条楼、断望，皆池名也，悉相连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断望接交趾界，产大珠，而蛋往采之，多为交人所掠。海水深数百尺以上，方有珠，往往有大鱼护之，蛋亦不敢近。”^[7]张师正说合浦海域有珠池十余处，但他只能说出4个珠池的名字，他是在容州当知州，可能没有到过合浦，估计是道听途说，似不可信。后来的方志中都没有说到有那么多珠池，如清道光本的《廉州府志》说有珠池六处，分别是：乌坭池、永安池、平江池、杨梅池、青婴池、望断池。民国时期编的《合浦县志》载为八处：平江池、杨梅池、青婴池、乌坭池、白沙池、断望池、海珠沙池、白龙池。清朝屈大均说合浦有七大珠池的说法，目前得到人们的认同。

他在《广东新语》书中说：“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日平江、杨梅、青婴，次曰乌泥、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其底皆与海通。”[8]今营盘镇的白龙圩有古白龙城遗址，白龙城俗称珍珠城。有人对七大古珠池进行了考证，认为断望池在今北海市营盘镇婆围村南面海域，与广东乐民池相对，距白龙池5公里；乌泥池是在今合浦县山口镇英罗港外南面海域；平江池大约相当于今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北暮盐场、川江村至营盘一带的海域中。杨梅池在今北海市营盘镇至白龙港一带的南面海中；青婴池大致范围在今北海市侨港镇南漓港至福成镇西村港一带；白沙池位置相当于今北海市兴港镇北暮盐场至合浦县白沙镇榄根村一带海域；海猪沙，又名海渚，在今北海市营盘镇白龙港一带的南面海中。合浦珠池之位置，均处于今北海市龙潭至合浦山口与广东乐民油之间。[9]甯纯所设置的珠池县范围估计就在这七大珠池的范围内。甯纯设置的珠池县，比孙吴时期的珠官郡更具有垄断性，遭到当地俚人珠民的强烈反抗是必然的。另外这些珠池都距离陆岸数十里的深水中，在当时涉及几个县的海岸，管理起来是很困难的。或许因为如此，珠池只存在6年时间，就不得不取消。

二、甯龄先与二次“珠还合浦”

“珠还合浦”是一个非常美丽动听的故事，其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古以来就在我国民间流传，以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珠还合浦”故事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东汉时期，与合浦太守孟尝有关，前面已经述及。第二次发生在唐朝，与甯氏家族族人甯龄先相关。两人皆为民请命，做了好事，为合浦的采珠业做出了贡献，后人都铭记着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出名与合浦珍珠名气紧紧相连，人借珠名，珠借人势，相辅相成。

合浦珍珠名气很大，清朝大学问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评价合浦珍珠的社会地位时说：“合浦珠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此评语流传出来之后，南珠名气便获得冠甲天下的地位。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中国的珍珠历史文化实际上就是南珍的历史文化。

南珠以细腻器重、玉润浑圆，粒大凝重、瑰丽多彩、晶莹圆润、皎洁艳丽、

光泽经久不变等优点称霸世界市场。南珠主要分布在我国“两广”、海南沿海，以广西合浦县白龙尾至西村约30公里的海区出产的珍珠品种为南珠的上乘之品。

海产珍珠贝喜欢在开敞的内海湾，水温 $15\sim 25^{\circ}\text{C}$ ，水质清澈水流平缓的泥沙中生活。在北部湾的合浦、钦州和防城港的沿海一带，历代分布有诸多珍珠池，形似海洋中的小盆地，底质多为洁白的细沙和小石砾，淡水不时从底部渗出，不断调节海水的盐度。这些珍珠池地处合浦湾，位于北部湾近陆海域，海湾开敞，潮流畅通，海域隐蔽，风浪较小，且两河流相夹，咸、淡水适中，东面有雷州半岛、东南面有海南岛，西有中印半岛，是防止风浪冲击的屏障。北有云开大山余脉，阻挡寒潮的侵袭。东南无内陆大河注入，浅海多为沙质或沙泥质，有60万亩平坦的沙砾。浮泥和敌害生物少、饵料丰富、无污染。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22.6°C ，最冷月平均气温 $10\sim 15^{\circ}\text{C}$ ，年均极端低温度 2°C ，日照时间年均日照时数为2108.5小时。属亚热带气候，气候温和，水温适宜，沿海水质清净无污染，浮游生物极其丰富，海水比重稳定，水温 $18\sim 32^{\circ}\text{C}$ ，平均为 23.5°C ，所有这一切为珍珠贝的生长与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好的生态环境产出了高品质的珍珠，高品质的珍珠又成为权力、财富、社会地位的象征。王室贵族都喜欢把珍珠穿缀成串，以作佩饰，或作珠帘而悬于厅堂以显其豪华。他们视珠之多少为富，相互攀比。此风也波及朝廷，相传汉高祖的未央宫的光明殿上就悬挂着珍珠做成的帘箔，而刘邦之妻吕后也不能免俗，竟以五百金之代价向珠贩购买“三寸大珠”。

对珍珠需求越多，珍珠价格则越高。所以当地人的谚语称：种千亩柑橘，不如一龙珠，采珠获利之丰厚可见一斑。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吸引更多人投身于采珠的行业，也吸引四面八方的商人来合浦做珍珠买卖，有人亦因此成了暴富者。

有人因珍珠而暴发，也有人因珍珠而致祸，东汉时马伏波将军便是其中一个。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奉命南征交趾，打败了征侧为首的叛乱，征战中，他为了预防瘴气，常以薏苡熬粥为食。因见交趾的薏苡颗粒大，返京时便装了一车回北方，岂料被京中权贵误以为是一车珍珠。当时马援为凯旋之帅，没人敢说，但马援不久染病身故，便有人上书皇帝，说他运了一车珍珠返京独吞。皇帝听了，

怒火万丈。马援的妻子也不敢将他归葬于祖坟，只在洛阳城西买了几亩地草草掩葬，连他的故友亦怕牵连，都不敢去吊唁。

历代统治皇朝多采取滥采珍珠的政策，严重破坏合浦海域的生态平衡，导致珠源枯竭，无珠可采的恶果。民间就有了珍珠逃离合浦，远走交趾的说法。据史籍记载，合浦海域第一次珠源枯竭发生在东汉时期，第二次珠源枯竭发生在甯氏家族统治合浦的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多变，连年战乱，合浦采珠业却获得休养生息，生态环境得以恢复。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唐朝初年。但是到了唐玄宗执政中期，再度兴起奢侈糜烂之风。宦官臣属搜刮财宝媚上，合浦珍珠又遭滥采之殃。采无定时，穷采而不知其度，合浦珍珠生产又遭毁灭性打击。唐代诗人元稹写下这样的诗句：“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万人判死一得珠，斛量买婢人何在。年年采珠珠避人，今年采珠由海神。海神采珠珠尽死，死尽明珠空海水。珠为海物海为神，神今自采何况人！”这是对唐代统治者贪得无厌、民不聊生的控诉，也是滥采造成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果的真实写照。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合浦海域已无珠可采。朝廷不得不下禁采令，合浦珠又得一次休养生息。到了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合浦珠贝又多起来，但朝廷仍未下开采令。当时任镇南都护府副都护，钦州人甯龄先看到当地珠民生活十分贫困，于是给朝廷写了《合浦珠还状》：“合浦县内珠池，自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二十年间，阙于进贡。今年二月十五日，珠还合浦。臣按《南越志》云‘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之宝瑞。其地元（原）敕封禁，臣请采进。”可知代宗时期由于官吏无政，疯狂采捞珍珠，致使珍珠资源濒临灭绝。直到懿宗时代才开放珠市。《旧唐书·懿宗本纪》卷十九上：咸通（懿宗）“四年七月朔，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合浦珍珠是合浦县附近海中某些贝类在一定外界环境刺激下，分泌并形成与贝壳珍珠层相似的固体，说珠会逃走是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的，只是民间口碑传说罢了。其实际情况是地方官为自己的私欲而滥采导致珠贝缺少的原因。唐开元（公元713~公元741年）末至唐天宝（公元742~公元756年）初，当权者强迫珠民掠夺性地

进行狂搜滥采，致使珠源枯竭，已无珠可采，“二十年间，阙于进贡”。在无可奈何之下，唐朝统治者已意识到对珍珠疯狂滥采带来的恶果，对产珠海域进行“封禁”。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唐广德二年（764年）二月二十五日，发现珠还合浦，已有珠可采了，于是甯龄先上状，建议开禁采珠，这就是采珠史上的第二次“珠还合浦”。

第七节 农业生产

汉代合浦郡是一个新设的郡，尤其是合浦港商贸营运开始后，在强大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四川人、贵州人、云南人、广东人、湖南人、中原人，还有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都涌入合浦城来经商。原来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突然变成一个大都市，吃饭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有人根据商业获取利润远大于农业的情况推测，合浦人都不从事农业，全去经商，所需的粮食可从外地贩运进来。最早这样说的人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史学家范晔，他在《后汉书·循吏传·孟尝》中说：“（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合浦郡不能生产粮食，人们以海中珠宝为生，商贩常将附近的交趾所产的粮食贩运进来。其实，范晔并没有到过合浦，他书中的记载只能算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说那些专门以采珠为生的珠民是不种田地的。但是，珠民的人数比较少，在合浦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从自然条件来说，当时环北部周围是冲积平原，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农业经济也很发达，绝大部分合浦居民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只不过由于合浦郡商业和采珠业的名气太大，才出现以讹传讹罢了。

考古学家在环北部湾沿岸境内曾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过一些经磨制而成的石斧、石镞，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经济活动。其中在北海铁山港区营盘镇东塘村西所发现的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规模最大，遗物散布面积达9万平方米。采集到较多的磨制的有肩石斧、石镞、石刀及夹砂绳纹红陶和灰陶。遗址正处于西沙河入海口附近。可见西沙坡的居民既会下海捕鱼，亦会从事农耕，他们是渔民，也是农民。

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以来，中原较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开始大量传入合浦，到了汉武帝设合浦郡后，这里的农业经济已十分发达，与中原地区已无太大的差别

了。这是有考古学依据的。1975年在合浦堂排发掘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五件铁锄和十余件泥做的铁锄。铁锄是当时的一种常用的农业工具，人们希望在阴间仍可使用锄头来种地。假如合浦无农业生产经济的话，以铁锄（锄）陪葬则是多余的了。该墓墓主人为男性，同时还出土有不少武器，被推测为屯戍该地的武官。由此可见合浦郡的行政官吏对农业生产也是十分重视的。从历年来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与农业经济活动有关的随葬品中，我们依稀看到当年合浦郡不仅是商业大都，而且也有男耕女织、六畜兴旺、稻米飘香的田园风光。

铁器是一种远比石质、铜质工具更为坚固、锐利且高效率的工具。考古发现说明，铁制的工具和农具在合浦一带的农业生产中已普遍得到应用。它使合浦地区大面积的农田开垦、耕作成为可能。合浦堂排墓出土的铁锄，是一种当时最流行的农具。锄的平面形状呈“凹”字形，弧刃，刃两侧上折，中间凹下有空槽，可安装木柄。它可用于掘土翻地、开沟挖渠、中耕除草。钦州甯氏家族隋唐墓中也出土有不少的铁器，器形有刀、剑、锅、棺钉等，但由于该墓葬早年被盗，估计随葬品中还有其他铁器，或许也有铁农器在内。

甯氏家族在钦州统治时期，相信已经使用牛耕技术。1982年11月在灵山县石塘镇红星村乐彩屯出土的铜鼓，鼓胸内壁铸有一水牛形象，说明水牛已使用于农作生产。东汉时期的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曾教授当地居民用牛耕犁。钦州、合浦是中原南下交趾的必经之道，先在钦州、合浦施教牛耕法，后布传至交趾当是意料中之事。考古发现已证实，南朝时期苍梧地区已有水田稻作农业，苍梧倒水南朝墓出土的犁田模型，具有浓郁的南方生活情趣。田的模型作四方形，长15厘米，宽15厘米；中间纵贯一条田埂，将田分为两块，各有一人在赶牛犁田。犁田俑左手扶犁，右手作扬鞭赶牛状。牛在泥泞的水田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显得那样的艰辛，那样的劳累。这位工匠如果对牛没有特殊的感情，是无法塑造出这样的作品的。最有趣味的是，这块水田的一角，还镂挖有一个漏斗状的小洞，这无疑是排水设施。广西多水田，每一块田的一角都挖有一个排水洞，工匠把这种不引人注意的排水设施如实反映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使之更富有浓郁的岭南生活特色。甯氏家族辖区与苍梧相邻，其生产技术也相近，他们同样使用

牛耕技术于水田稻作是可以肯定的。

合浦境内南流江水网发达，给农田灌溉提供了便利。除挖凿沟渠将河溪之水引到农田外，挖井取水灌溉也是一种办法。合浦汉墓中出土有不少陶井模型，具体地展现了当时的挖井技术。水井一般为圆形，井口修建有井台和围栏，并用木柱支撑着可遮阳光挡雨水的井亭盖。当然，不少水井是为解生活用水而凿，但并不排除井水用于庄稼灌溉之用。

对农作物施肥，是保证农作物丰收的重要条件之一。汉代合浦农民早已掌握对农作物施肥技术，因此，他们很注意人畜粪便的积蓄。从汉墓出土的一些陶屋模型中，其中设有厕所和猪圈，就反映了其积肥的情况。如曲尺形模型陶屋，在屋后有一个露天猪圈，用矮墙围圈起来，猪就在里面饲养。出土的干栏式房屋模型，下面也设有单间厕所。

铁农具的推广、牛耕技术的使用和灌溉设施的不断完善，不仅使人力得到解放，也极大地提高了合浦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当时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应是水稻，在合浦汉墓中可以看到有用铜锅或陶仓装稻谷陪葬的现象。令人惊奇的是，广西文物工作队于2003年11月间在合浦风门岭发掘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座陶仓，陶仓中所装载的橙黄色稻谷，居然还色泽如新。在合浦西汉晚期墓中，有许多粮仓模型出土。粮仓一般像一座长方形平房，但三面密封，和住人的房屋有较明显差别。粮仓模型有陶质，也有铜质的。合浦母猪岭1号墓陶仓为干栏式悬山顶建筑，面阔3间，进深2间，前有走廊，开门一道，板瓦顶，正脊，垂直上有博古装饰。合浦望牛岭一号墓出土的是铜仓模型，长79.3厘米，高37.3厘米，宽42.7厘米，悬山式瓦顶，前后各有12道瓦垄，板瓦状。前面正中开双扇门，各有门环。仓前面有走廊，廊前缘有栏杆。仓底有短圆柱8根，把整个仓房顶离地面。这种干栏式的粮仓具有优良的防潮功能。汉代合浦人重视粮食储备，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合浦周围聚集大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创造了最根本的物质条件。另外，在墓中出土的陶瓷器有碗、碟、钵、釜、杯、瓶、壶等。其中的釜是煮饭用的，碗、钵是盛饭用，瓶、壶是装酒用，杯用作喝酒。只有在农业生产发达的情况下，才能有如此分工细致的生活用器出现。酒器较多，说明喝酒已成为普遍现象。而酿

酒需要有大量的粮食，说明甯氏族家族统治时期，农产品较丰富，已有富余的粮食来酿酒了。

汉代合浦农民不仅种水稻、驯养家畜，同时也栽种果木。合浦堂排汉墓的一铜锅中曾出土有荔枝的果壳、内核；而另一个小铜盒上则发现杨梅果核。这正是果树栽培的实证。在汉代，岭南的龙眼、荔枝已驰名全国。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朝皇帝为了吃到新鲜的荔枝，命令各地方官设驿站，昼夜快马加鞭，将荔枝运往京城。

各地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与原始宗教相联系。甯氏家族铸造并使用的灵山型铜鼓，也曲折地反映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宗教仪式。这类铜鼓的鼓面上不但有单体青蛙，而且有双累或三累青蛙，这是别的类型铜鼓所没有的。青蛙的艺术形象在灵山型铜鼓上的突出表现，说明当时的人们是崇拜青蛙的。而人们之所以崇拜青蛙，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因为农作物都离不开雨水。现在桂西地区的群众还有以铜鼓卜岁的习俗。每年春节前后，广西东兰县的群众都要举行青蛙节活动，实际上是用铜鼓与青蛙进行卜岁活动。每年春节前的特定时间，将青蛙置于铜鼓面上一并埋入土中，次年将铜鼓与青蛙掘出，视铜鼓和青蛙骨头颜色变化情况卜占年内是否风调雨顺。若鼓面与蛙骨呈黄色者为吉，当年必风调雨顺，呈黑色者为凶，预示当年年景不佳。后来所卜葬的铜鼓常被偷盗，遂不再卜葬铜鼓，改为只卜葬青蛙。但在卜葬青蛙时一定要敲击铜鼓，高唱铜鼓歌，否则蛙卜也会失灵。在自然界中，青蛙与天雨关系最密切，俗语说：“青蛙叫，大雨到。”古代人民没有科学的水利设施，种田靠天雨，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否则谷物歉收。由于过度依赖天雨，便产生了崇拜青蛙为雨神的心理。灵由型铜鼓上大量出现青蛙神形象，不仅说明在其分布范围内已有大片的水田存在，而且也反映出“崇蛙祈雨”的观念也同样在当地深入人心。

第八节 海外贸易

1981年发掘的钦州久隆石狗坪刘屋村双墩甯氏族家族1号墓中，出土1件高足玻璃杯，杯通体青绿色，吹制而成，高足，深腹，壁薄，口径7.5厘米，足径3.8厘米，通高8厘米，出土时已破碎。经能谱分析，含氧化铅，属于高铅玻璃

系统。目前我们仅在1号墓中发现1件玻璃杯，至于说众多的甯氏族墓中还有多少玻璃制品，尚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地说，甯氏族墓中陪葬玻璃制品不会是绝无仅有、就此一件的。那么墓中出土的玻璃器是舶来品还是本地制造的呢？这涉及甯氏家族的对外贸易问题。在未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北部湾地区的海外贸易情况。

北部湾正好位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西南端，其东侧的雷州半岛，像一块隆起的大陆向南海中凸伸，形成了一个浅弧形的、宁静而又美丽的海湾，挡住了南太平洋袭来的暴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使中国汉代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几个出海远航的港口，其中合浦港就是当时南中国海域最好的天然良港。

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言，合浦濒临北部湾，其地势北高南低，有南流江由北而南穿过境内而汇入南海，是一个具有水深、避风、便于船只停泊，有利于物资装卸、集散的港口。在西汉时期，航海的船舶远不能和近现代船舶相比，其船体不可能太大，吃水也不能很深，通常港口的水深一般不成其为问题。相比之下，避风的条件则显得更为重要。仅从今天南流江入海口的乾体港的平面位置看，其东南面有高大的丘陵山地凸伸于北部湾海域中（即今北海冠头岭和北海市市区），形成半月形的天然屏障，有效地阻挡强烈的季风，使停泊于港口的船只免受风浪的袭击。

港口是货物进出口的中枢，方便货物的集散是优良港口的重要条件之一。出口的内地货物需要运到港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也要销往内地。这就要求港口和内地的交通必须便利。在古代，货物的运输不外是分水路和陆路两类。陆路运输依靠人力或畜力牵引的车辆，或用人力和畜力直接驮运。相比之下，水路运输因更方便、快捷、省力而尤为重要。合浦港位于南流江的河口，南流江发源于北流县境内大容山南坡，向南流经玉林、博白、合浦，注入北部湾。全长287公里，流域面积8635平方公里。南流江是广西南部独流入海诸河中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丰富的河流，它流贯玉林盆地、博白盆地和南流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光、热、水、土条件较好，盛产稻谷、甘蔗、花生、水果、烤烟，从古到今

都是重要的农业基地。而在南流江的发源地大容山的北坡，也有一条向北流的北流江，流经北流、容县、藤县，注入浔江，全长 121.6 公里，流域集雨面积 165 平方公里。在北流江和南流江的上游之间，有一个“桂门关”（又称“鬼门关”），可以沟通二江运输。当年马援征交趾，就是从湖南溯湘江而上，经过广西兴安灵渠，顺桂江而下，至梧州溯西江而上，至藤县进入北流江，逆水而行到北流县，陆行翻越桂门关，进入南流江，顺流而下以至合浦，与从番禺（今广州）而来的段志率领的楼船水军会合，然后从合浦进军交趾的。北宋时，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岛，后遇赦免，也是到合浦循此路线北返的。所以，合浦港与内地河流组成的交通线，有着深远、广阔的背景，是一条主要的货物运输的大动脉。

不仅如此，合浦港更是中国南部与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早在汉代以前，北部湾沿海越人就与东南亚地区有文化贸易交往；到了汉代，环北部湾地区的合浦、徐闻等港已成为官方港口。《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约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携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已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官方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穿越南海、印度洋至东南亚、西亚各国进行商贸活动和海上航路的最早记载，也是最重要的史料。这短短的、不足 300 的文字记录内容极为丰富，它涉及了出海的港口、途经的国家、路程和航行所需的时间、商船人员的组成、贸易货物的种类、海上的风浪和海盗抢劫的情形，还有受至异国他乡人民的盛情款待等等，因此它成为史学家们开启海上丝绸之路奥秘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记载中所提到的出海港口有日南障塞、徐闻和合浦。日南障塞在今越南，徐

闻则在今广东境内的徐闻县。从常理而言，汉代中国官商船队的首次试航只有可能在一个港口开始，那么哪个港口是始发呢？文献没有记录，于是便有了争议。广东人抢先发布新闻说，经专家论证，广东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广西北海人也不甘示弱，说毋须论证，广西合浦港也是始发港之一。当然这种论争始终是没有结果的。也许《汉书·地理志》只是记录当时中国商船都曾从这些港口出发的事实，出海的商船不可能只有一次，而是许多次，有时可能从合浦港出发，有时也可能从徐闻港出发。既然分不清楚，还不如退后一步说，合浦、徐闻等都是始发港之一。不过所谓的始发不再是表示最早首航的那个含义了，始发港只有开始出发的含义，是该次航行之始，是离开中国远航他国之始。

事实上在远古时代，北部湾海域的原住民族就存在过早期的航海活动，只不过它是属于小规模、分散的民间行为而已。这条航道有在西汉前期的南越国就已经开通的可能。但学者们倾向性的意见是，海上丝绸之路确立之年代应在汉武帝时期，这是从中央王朝正统观念出发的结果。其实，《汉书·地理志》并没有具体记述始航的时间，但却提及黄支国（在今印度境）人口众多，地域辽阔，风俗习惯与海南岛的原住民相似；所产奇珍异物，自汉武帝以来就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当然，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于合浦设郡之前，中国汉朝官方商船是不可能在合浦出海的。汉武帝在合浦设郡是在公元前111年，虽然难以确证汉中央政府在平定南越国的同年就能迅速完成海外贸易始航的策划，但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推断，可以认为首航时间应在公元前111年~公元前110年。

据考证，从日南障塞（今越南岷港）或徐闻、合浦出发，沿中印半岛南下，船行5个月，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全程1060海里（1海里=1.852公里）；船再行4个月，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全程840海里；再船行20余日，到谶离国（暹罗古都佛统），全程100余海里。由谶离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前行10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全程300海里。再船行2个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建志补罗，出海口为马德拉斯），全程1728海里。黄支国以南有已程不国（*sihadvipa*，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朝派出的使者到达这里后则按原路返航。

《汉书·地理志》还有这样记述说：“有译长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其中的“璧琉璃”，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玻璃，可见玻璃是当时海外输入货物的大宗。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专家们通过对世界和中国出土古代玻璃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确知世界上的古玻璃可分三大类。第一类含有较多钠、钙成分的古玻璃，称钠钙玻璃，是古罗马、埃及等西方国家所生产。第二类含铅、钡成分较多的则称铅钡玻璃，是中国中原地区自己生产的古玻璃。第三类玻璃含钾成分极高，产地主要是在东南亚国家。

虽然中国的铅钡玻璃很早就为中国古人所发明制造，但其发展缓慢，并一直保持着固有的特点，既具有绚丽多彩、晶莹剔透的优点，又有轻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的缺点。这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铅钡，烧成温度较低所致。铅钡玻璃不适合制作饮食器皿，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等。相比之下，西方古玻璃一直以钠钙玻璃为主，耐温性能较好，对骤冷骤热的适应性较强，因此，西方古玻璃的用途和生产量都远大于中国。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玻璃器物中，有一些钠钙玻璃，可见它们是从西方输入的。从遥远的西方把玻璃运抵中国，其价钱自然十分昂贵，因此拥有西方玻璃制品多是统治阶层或富豪。中国各地两汉时期墓葬出土的一些钠钙玻璃制品，证明了西方古玻璃输入中国各地的史实，其中的一部分当从合浦港入口。

唐宋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发明了高铅玻璃，这种高铅玻璃可耐高温，适合制作饮食器皿。如陕西西安郊外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瓶、玻璃盒、小杯、玻璃蛋形器等；唐李泰墓出土的黄玻璃瓶，经化学成分分析含氧化铅高达64%以上；北宋时期，铅玻璃又有了新发展，如甘肃灵台出土的一块玻璃残片，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含氧化铅高达50.31%、氧化钾达10.09%，是一种钾铅玻璃。

钦州甯氏家族隋唐墓出土的高脚环璃杯，含氧化铅高达62.19%，氧化硅达34.92%，属于高铅玻璃系统。问题是这件高铅玻璃杯是中国内地产品还是从东南亚舶来品，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从考古发现情况看，中国内地出土的高铅玻璃不多，而且都是在贵族墓中出土，说明此类玻璃还是比较稀少。《隋书·何稠传》载：何稠“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

波斯尝献金锦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何稠这个人很聪明，官也当得大。他竟然能仿制波斯“金锦锦袍”，比原件还漂亮，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当时中国无人能制造玻璃，何稠则用绿的釉瓷仿制玻璃，与真玻璃一样，隋文帝非常高兴，给他追加员外散骑侍郎官职。上述事例说明，隋朝时期中国能制作玻璃的人少有，钦州甯氏家族隋唐墓出土的高脚玻璃杯显然不是从内地传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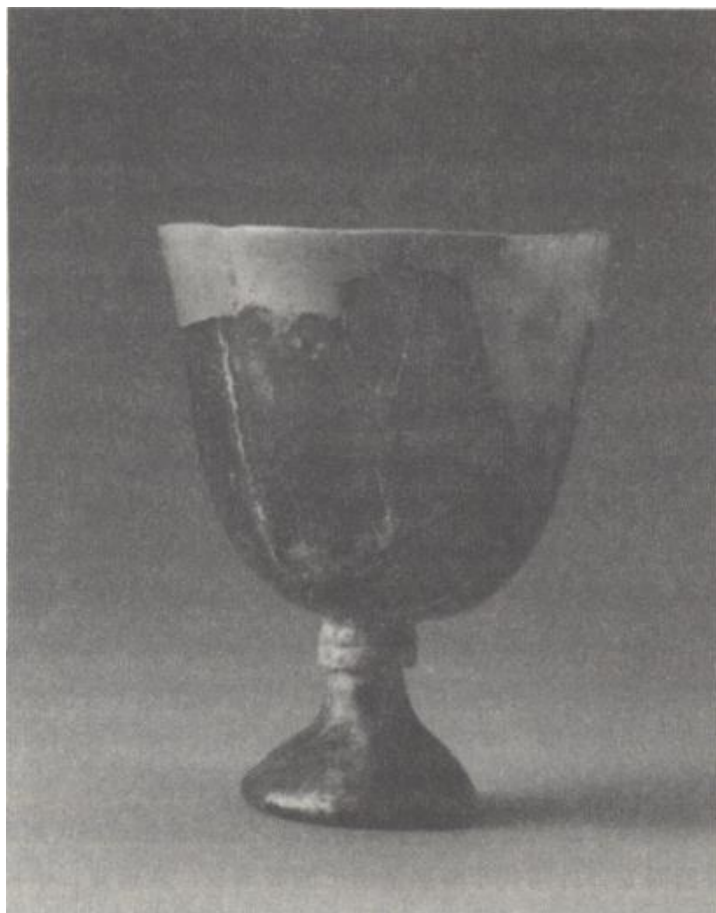


图 3-18 甯氏墓出土的玻璃杯

再且，此件玻璃杯是吹制而成，吹制技术最早来源于西方古罗马和古埃及。而玻璃在古代中国则几乎长期被定位在玉石的廉价代用品上，玉色的不透明或半透明质感似乎无法摒弃，铸造后进行与玉器加工一样的精细打磨成为主要的技术程序。另外，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尽管中国铅钡玻璃传布地区，但也是高铅玻璃生产地。据此推测，钦州甯氏家族隋唐墓出土的高脚玻璃杯当来自海外，是甯氏族人用某种物品从海外交换来的。

钦州地区有着连接广东和交趾交往的沿海枢纽通道的区位优势。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和商品集散之地，商业贸易相当活跃。隋唐时期，钦州、合浦是犯罪的朝廷贵族和命官流放地。这些人在官场失意，在商场则非常活跃，很多人流放到钦州、合浦后都因经商而发大财。前文所说的王章，其家属就是因做珍珠生意发大财的。这些商场精英的出现，促进了当地的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易场所——圩场也在各地形成并发展起来。如宋时在钦州市钦江东岸设置的“钦州博易场”，是当时广西地区三大博易场之一（另外两处分别设在今宁明县境内的永平寨博易场和今田东县县城附近的横山寨博易场），是当时官方专门开辟的国际商品贸易场所，也是两广地区与交趾（今越南）及南洋诸国进行贸易的沿海市场。外商用船从海上运输金、银、铜、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珍珠、象齿以及鱼蚌等产品到钦州博易场，换取两广的大米、布、笔之类的日用品。尽管是官办的博易场，但还是分有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民间贸易主要是双方民间或小商贩之间进行的小商品贸易；官方贸易则是双方官商富商之间进行的大宗贵重货物的交易。交趾富商和官商带来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铜、犀角、象齿及各种名贵香料；我方的官商富贾主要是从蜀地贩运锦罗之类的名贵布料、织锦等与之交易。再将交换来的各种香料转运到内地销售。这种大宗货物的交易，每次成交额都很大，动辄数千缗。

甯氏家族的造船业非常发达，不但有传统的独木舟、拼板船，还能制造出高大的楼船。从文献记载可知，甯氏家族的航海能力是很强的，可以把数千人的军队所使用的马匹、粮草运送到交趾、林邑，这在当时的岭南地方割据武装中也仅此一家。既然甯氏家族在战时能将数千军队运到大海彼岸，那么他们在和平时期出船到东南亚及南洋诸岛进行商品贸易是不容置疑的。

[1] 民国《灵山县志·輿地志》。

[2]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3] 蒋廷瑜：《壮族铜鼓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

[5] 覃尚文主编：《壮族科学技术史》，第313页，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6] (唐)刘恂：《岭表录异》，鲁迅校勘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7] (宋)张师正：《倦游杂录》，转引自《壮族科技史》77页，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8]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

[9] 廖国一：《环北部湾沿岸历代对珍珠的采捞及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